



中國：政策激化矛盾 群眾抗爭加劇

來自大慶的報告 關於「統計腐敗」問題

阿根廷危機特輯 阿根廷人民起義

越南近況 巴西大選面臨歷史時刻

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 安龍式的騙局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官商緊縮開支 市民被迫犧牲

振言

香港政府早前曾公開推斷，01至02財政年度將有656億港元赤字。這個數字有無像以前那樣被大大高估，稍後即有分曉。財政司長梁錦松跟著提出他上任後第一份財政預算案，預料下年度仍會出現452億元赤字，要5年才能達到收支平衡。這預示在未來5年內要大幅收緊開支，把公共開支削減到本地生產總值20%或以下，港人被迫必須為此作出犧牲。

他本來應該宣佈實行各級累進利得稅，以大量增加收入、彌補赤字的。許多工商業資本家在香港大獲溢利，理應按獲利比例納稅；而且有多個工商業團體也表示同意（或不反對）增加利得稅；但他卻不肯這樣做。

他提出要各級公務員減薪4.75%，而又否定了高薪「公僕」應削減多些薪酬的合理做法。如果實行18萬公務員和16萬資助機構員工同比率地減薪，這對低中層員工很不公平；他又未與公務員及其工會磋商和參照仍在進行的私營機構薪酬趨勢調查，便單方面作此建議，更激發了廣大公務員及其團體的強烈反對，其中一部份還聲言要採抗爭行動。這樣的反應，迫使高官們不得不轉變口風，以緩和不滿的情緒。其實，必須大幅度減薪的，應該是政府、公營資助機構的首長級和高級人員，他們至今享有非常高的薪酬待遇，單在01年便提高了4.99%，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相類似職務的高層人員；而低級的公務員和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卻不很高，同比率一刀切地減他們薪，難怪激起他們的普遍反感。而當局這樣做也勢將鼓勵資本家照樣去做。

他拒絕了環保人士的提議，徵收環保稅，而且連研究工作也不進行，態度保守。他只指出，港府未來會考慮「商品及服務稅」，和削減薪俸稅個人免稅額。這是回應政府委任的研究擴闊稅基委員會不久前提出的報告建議的，這個報告赤裸裸地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維護其利益，而主張由中下階層市民多負擔稅項（因為商品及服務稅是廣大市民無可避免要負擔的）。如果將來實行或部份地實行這個報告的建議，則港府便會進一步擴大貧富懸殊的鴻溝，而不僅僅是沒有表示關切如何去阻止其擴大，縱然這個新預算案在公眾壓力下宣佈一次過地寬免了一年的差餉和水費

等措施。

預算案提出各部門未來4年的開支只有1%的增長。如果這又是一刀切的規定，則對港人的醫療福利等的影響很大。醫管局現時預算02-03年度的收支與政府的撥款預算相差5.82億元，這項巨大赤字要由醫管局自行承擔，雖然它現時仍有10億元左右的財政儲備，但它仍要盡力在病人身上打主意。例如：決定實行急症室收費（一度提出每次收150至200元，從而廢除過去港英時代從不收取費用的市民這項應有福利）；考慮不給予病人貴價的新特效藥，門診提高收費及加收藥費每次10元，提高公立醫院內私家病房的收費至成本以上，現有合約制醫生約滿後將不續約，等等，從而影響醫療服務質素及加重病人負擔。

房委會也預算下年度將有20億元的赤字，估計05至06年的赤字會到32億元，以此作為增加收入、緊縮開支的「理由」，從而會減少興建公共房屋（包括居屋），重新幫助私屋發展，掀高物業和租金的漲風。

預算案又透露，政府在現財政年度再出售150億元地鐵股份後，會在04至06年再出售200億元政府資產。據了解，九鐵、機場、政府隧道和郵政服務都會在考慮出售之列。這些涉及公共服務的機構一經私有化後，其管理層必然以盡力追逐商業利潤為目的，盡可能經常增收費用，因而大大加重市民的負擔，而收益則落入私人的口袋裡。

港府是香港最大的僱主和業主，但多年來藉助於外判和中介公司之手（後者從中增多一重剝削），實行低薪聘用員工，以致食環署公廁清潔工被揭發時薪只有7元，全年又無法定假期休息等無良壓榨。庫務署在被批評後雖向各部門發出工作指引，但文職員工仍不受指引保障，有些中介公司把臨時文書助理的月薪定為4千元不到，供應給水務署，每日工作時間則為8時半（3月17日《東方日報》報道）。這是僱主無良的又一例證。

香港的失業、半失業率不斷在上升，據官方預測行將升破7%。而香港工商業資本家便利用現時失業率持續高升乘機加緊壓榨僱員。據香港僱主聯會的調查顯示，傳統上在1、2月調整薪酬的公司中，有9成員

工被凍薪甚至減薪，較對上一年勁升近1倍，並有72%的公司表示未來仍會繼續凍薪。這些公司，很多都並非由於營業狀況差、少賺錢的。

以大企業的電訊盈科來說，它在97-99這3年內每年都有110至170億元的純利，去年的盈利淨額也近19億元，但仍然不顧員工和工會的激烈反對，繼3個月前裁減3506人之後，再在最近裁去858人，而且聲言未來幾個月還要再裁，這迫使在職員工在工會領導下實行按章工作，以示抗議。由於李澤楷控制的盈科在收購電訊時依靠大量舉債，每年利息支出龐大，去年便逾30億元，使該公司的盈利減少，這等於要該公司員工代盈科付出收購電訊的代價（它在當年合併時，還預先大造聲勢，很不等價地吸取了大量「股

民」的血汗投資）。這是香港政府法例在不干預的借口下偏幫大企業財團的最新事例。儘管如此，它還把近年純利減少歸咎於政府之開放電訊業，打破了它長期以來的壟斷特權，香港電訊公司因擁有這種壟斷特權，迫使港人過去必須付出非常高昂的電話等費用。電訊盈科的大老闆仍在留戀這些日子，幻想這種時光會倒流。這個家族過去受益於港英政府的「三高政策」，急劇地推高地產物業價格，暴發成為全球頭幾十位最富有者之一，而全港市民則長期蒙受捱貴租的痛苦，由此充分顯示出香港這個社會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極不合理性質。

2002年3月25日

反對郵政署變相大加郵費

微波

香港的重要公營公用事業之一的郵政局，不顧全港經濟連年不景、民生困苦、各行各業經營困難、通縮持續、物價下跌，大量僱員遭遇裁員減薪、失業日多、消費力弱等情況；也不理高官呼籲（縱然是假仁假義性的）全港市民忍受目前的艱難、同舟共濟，工商服務各業減價促銷；更不理社會各界普遍要求政府及公用事業機構減免收費及稅項，卻仍然一意孤行，實行從4月1日起大幅增加本地部份郵件收費，而作為其主管的香港政府也聽任它倒行逆施，不吭一聲，不加阻止。這實在使人氣憤！

這次增加最多的是取消了本地的二等（即印刷品）郵件收費，一律作為一級郵件（即封口的信件）計算，這樣一來，它就可達到變相地大幅增加部份收費的目的；原屬二等郵件中的大部份級別的加幅都在25%左右，而1千克的印刷品更增至42.60%，有的則增加14%或16.7%，本地部份一級郵費也增加一至二角；內地、澳門、台灣的一級郵費增加1成左右。這樣的大加收費，不但加重了一般市民的負擔，而且對文化出版事業更是一大打擊，落井下石般加重這個事業行業的經營困難。

長期以來，香港和中國內地、世界各國一樣，都是分開兩等級收費，二等的印刷品收費特別低很多，

這主要是為了幫助及促進文化出版事業而採行的優惠政策，香港即使在港英統治下成為殖民地，也一直是如此。但僅僅在回歸「社會主義祖國」還不到5年（且不說「50年不變」的承諾了！），特區政府便取消了港人所享有的這項權利，實行唯利是圖，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赤裸裸地榨取民脂民膏，打擊文化出版事業，再一次撕破回歸前高掛的「香港明天會更好」的美麗面紗。在郵政署的新收費表上，還列著內地及其他地區、國家的印刷品與信件的分別收費，只是這兩者都被增加了郵費而已。

而且，十分可恥的是郵政署高層明知這樣做法非常不合理，見不得光，因此，他們對傳媒報章發佈的加費消息，只說本地郵費增加一、二角的事，而完全不提取消本地印刷品的一向優惠收費，以致港人從報章上看到的，只是部份地增加一角、二角的微小數額問題，從而誤導外界、蒙混過關，避免了公眾的激烈反對。

我們在此除了揭開郵政署高層這些損害香港社會和市民權益的醜惡行徑之外，還呼籲市民（包括文化出版界人士）起來反對這次的收費做法，要求立即加以撤銷！

2002年3月24日

政策激化矛盾 群眾抗爭加劇

張開

朱鎔基在今年人大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他隨後在記者會上的答問，以及其他高官的報告，分別顯現出中國當前的社會、經濟等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反映出中共的政策加劇了人民的困苦，激發了群眾的強烈抗爭。

「工作的成就和政績」

他循例在開頭宣讀了一年來的主要「工作成就和政績」。其中說，經濟比上年增長了7.3%，2002年的增長率預定為7%，使連續多年保持高速度的增長率。這比之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高出很多的。不過，這個數字卻受到一些論者的質疑，即使是朱鎔基的報告仍然再一次承認「弄虛作假」嚴重。據報道，「地方政府虛報政績，對經濟增長弄虛作假亦是代表們的討論熱點。」「對於虛報浮誇，國家統計局局長朱之鑫也發現這個問題。……據統計，去年涉及統計的違法行為達到6萬多宗。」^{<1>}

這樣的經濟高增長率又是伴隨中央財政的高支出的，後者比上年增加了10.1%，使財政赤字達到3098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年增加500億元；同時，國債發行額為2560億元（他在任內共發行了5100億元國債）。02年的國防支出比上年支出1千4百多億元增加252億元，增長17.6%，科技支出408億元，據觀察家相信，其中一部份本應是用於國防費用的，顯示中國仍然在參加軍事開支競賽。

朱鎔基在任內連續4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是赤字，而且越來越高，以致香港的《信報》稱之為「赤字總理」。他在記者會上力加否認，說赤字和國債發行數額，仍然在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內；而且，至為重要的是這個赤字用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因此，我留給下屆政府的不止是債務，而是25000億優質的資產」。如果他所說的優質資產是指新中國建國以來積累下來的國有財產，那就不是他在總理任期內個人造成而留下，而是全國人民半個多世紀艱苦奮鬥積下來的。他之所以在記者會上著力指責港報，「十分扯火，主要是在今次兩會中，已經有不少代表、地方官

員和經濟專家對中央財政的連年龐大赤字十分不滿，批評朱內閣只靠赤字刺激經濟，給將來經濟埋下隱憂。……遼寧一名市長還說了一個順口溜：『中央財政蒸蒸日上，省裡財政喜氣洋洋，市裡財政勉勉強強，縣裡財政哭爹喊娘，鄉裡財政名存實亡。』」而朱鎔基則以此「還擊了政府內部對他的批評。」^{<2>}

「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大力誇耀成績之後，朱鎔基不得不勉強地承認：「當前經濟和社會生活中還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一些糧食主產區和嚴重受災地方農民收入減少，有些地方拖欠工資嚴重，部份企業生產和職工生活仍有困難，就業壓力加大。產業結構不合理和經濟體制深層次問題尚未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依然相當突出，地方保護主義屢禁不止，市場經濟秩序有待繼續整頓。一些地方、部門和領導幹部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弄虛作假、鋪張浪費嚴重，一些腐敗現象還比較突出。有些單位違規挪用財政資金和專項資金。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比較普遍。重大安全事故時有發生。有些地方社會治安狀況不好。」

他依循一向以來的慣例，把那些缺點、錯失都輕描淡寫地說成是「一些」、「有些」、「部份」存在的，而且不提貪污腐化的嚴重問題。但在人大會上，代表們卻決議把「一些腐敗現象還比較突出」中的「一些」兩字刪去，表明連代表們也看不過眼、不表接受了。關於報告只提到「對那些違法亂紀、以權謀私的人，必須徹底查處」，則加上「貪污腐化」這一類人，且在「查處」後面增加了「加大治本力度，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的表述。這就表明了：儘管增刪了的文字仍然是官樣文章、形式遠多於實質的意義，但中共高層提出的反貪污腐化，也是敷衍塞責的。原中共江蘇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曹克明在上述決議作出之前，還要強辯：「至於腐敗越反越大、越反越多、越反越嚴重的這一社會普遍說法，曹克明稱其為認識上存在誤區。」^{<3>}這說明，中國社會上這樣普遍的認識，正是客觀上存在的確實反映。黨官

們的矢口否認，也是他們不願徹底清除貪污腐化的心理反映。但蕭揚在法院工作報告中卻也承認，01年全年共判處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份子20120人（比上年增加了44.35%）；共受理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行賄案件493件539人，審結478件525人，比上年上升了26.1%和24.7%。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韓曄濱也報告：全年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罪案36447件40195人，情節嚴重的共立案偵查1906件，比上年上升39.4%。這就是社會上有上述普遍說法的根據。

入世對「三農」的不利影響

朱鎔基一方面把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列為政府工作的「顯著成績」之一；另方面又對美國記者公開承認：

「中國現在的糧食已經供過於求，農產品越來越多，種什麼，什麼多。價格上不去，農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不起來。特別是中國參加WTO以後，美國的農產品還要大量地在中國登陸，……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大豆已經相當於中國全部的產量：1500萬噸。當我們想採取一個轉基因農產品管理的辦法，實行國際上很多國家實行的辦法的時候，你們美國的領導人就來跟我們談到大豆的問題，影響美國十億美元的出口，你們要慎重一點兒。但是你們對中國出口的鋼鐵產品，你們卻宣佈要加稅8%到30%，這樣就影響中國3億5千萬美元的鋼材沒法向美國出口。」^{<4>}此外，其他農產品（大米小麥等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影響。這種不平等貿易關係，正是由於世貿組織本質上是發達國家利用來壓榨欠發達國家的工具；這也顯示，中共高層之重複聲稱要同美國建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是以不斷讓步來追求的一廂情願想法。

而且，正如陸德泉教授所指出的：「中國在加入世貿的短短4個月間，不平等世貿規則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便暴露出來了。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開始利用知識產權條款，奪取中國沒有申請的專利，據一些政協委員估計，過去15年，中國將13萬項發明無償地『奉獻』給了世界各國。其中僅中國傳統的中草藥一項，由中國人研製開發和改良，但卻由外國公司取得專利保護的項目就有9百多項。另一方面，跨國企業通過專利權，開始圍剿中國的企業。」^{<5>}

中國入世更加劇對農民的打擊，從上引的答問中已可得到具體證實。廣大農民的收入將會減少。中共提出的補救辦法，例如產業結構調整，並不能立即收

效，增加農民的收入；農村稅費的改革，經過一些地方試點推行，也難以大大減輕農民的負擔，如果大幅減少稅費，又影響農村的公共服務，受苦的還是農民。這是因為縣以下的龐大支出仍要由農民負擔。

舉例來說，中共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年前寫了《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心裡話》給國務院領導的信，列舉具體實況，指出「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6>}後來他再寫了一本書，書名《我向總理說實話》，詳細列出現時農村的各項費用負擔，包括：每年僅債務6千億元的利息便要付出800億元，義務教育老師的工資800億元，書雜費、設備添置維修等500億元，縣、鄉、村幹部3千9百多萬人工資2千億元，縣、鄉、鎮、村的科、局部門等3千億元。〔單是以上5項便合共7.1千億元——引者〕；縣以下的支出中，有7至8成要由農民負擔。因此，他估算農民實際上每年至少要負擔4千億元以上，遠遠高於朱鎔基說的現只負擔500億元。該書於今年1月由《光明日報》社屬下一個機構出版，成為暢銷書。^{<7>}這樣龐大的支出，便是農民的沉重負擔無法減輕的重要原因。李昌平這個估算，與前面所引那位副市長的順口溜形容的縣、鄉財政情況不謀而合地相一致。

在農民收入減少、而稅費負擔又非常沉重的情勢下，農民被地方官僚幹部追收所欠稅費和攤派款項，從報章上時有見到的手法，是關押、毒打、搬走農民家中僅有的糧食牲畜和生產工具……，以致迫得許多農民在絕望無助中自殺。新華網披露：新華社記者在去年10月底前後，前往曾被稱為「湖廣熟，天下足」的湖北省3個縣市的8個鄉鎮實地採訪，結果發現該省在01年1至10月內發生了7宗農民因不堪過重的賦稅而自殺的慘劇（記者沒有採訪得到的該省其他同類慘劇相信還會有一一引者。）農民要負擔的稅費非常多，長期入不敷出，導致極度貧困。湖北省監利縣縣委書記杜在新表示，該縣鄉村5億4千萬元債務中，大多數是農民欠交的，如柘木鄉有3百多農戶，每戶欠款都在12000元至15000元以上。^{<8>}

上述的農村收入減少而負擔沉重的情況，實在是普遍存在於農村的，但朱鎔基們依然只說是「一些糧食主產區和嚴重受災地方」才有的。

而對於解決辦法，仍然主要在重提黨八股式舊調；或者，例如對於拖欠幹部、教師等的工資，最多是責成「有關地方政府務必採取有力措施，盡快加以

解決」，而沒有提出實際有效的辦法。這些舊調幾乎全靠地方政府官員去落實執行，但人民卻無權力去監督、彈劾他們的「欺上瞞下」、陽奉陰違等行徑，結果決議等仍流於紙上談兵，抽象無效，長期如是。

如果中共不是只在空談，說的漂亮，做的又是另一套，那就必須在實際上撥出足夠的財力、物力去支援「三農」。例如，它要實施科教興國這個重要戰略，但在財政撥款上卻很吝嗇。全國政協常委農業部原副部長路明在這次政協會議上指出：目前影響中國農業科技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三個：一是農業投入偏低。中國到1999年算出一筆賬：農業科技投入是60多億，佔農業總產值的0.4%。第二，農業科研和推廣體系改革難度比較大。第三，農民數量多、科技素質低。<9>

中共高喊了幾年，尤其是更加強調要特別加大支援農業、農村，以加強農業科技發展的今天，財政部長項懷誠的財政預算報告提出，2002年中央財政將安排農業綜合開發、農業科技、扶貧等支出共274億元，比之2001年決算用於增加要對天然林保護工程、農業綜合開發、農業科技、農業產業化經營等方面的投入共支出233億元，並沒有增加很多，而且包含了這麼多的項目，農業科技方面實際分派到多少，官方還在玩弄數字遊戲，沒有詳細公佈。這些對農民現時之更加要求國家改變一向的多取少予政策，並無很大的幫助。

在「三農」危機日益加深加劇的時候，許多地方的農民便被迫起來請願抗議、上街示威，反對稅費負擔沉重和地方幹部的貪污舞弊、官僚惡行，等等。

對國企和工人的打擊

在中國入世後，中國企業又將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會導致更多國企關閉或裁員，加劇現時下崗、失業的嚴重情勢。

曾培炎向人大會議報告：現時「就業和社會保障的壓力增大。截止去年底，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仍有500多萬人沒有實現再就業，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還有681萬。」登記失業率為3.6%，加上國企下崗職工，總量在1200萬人左右。據有關權威部門預測，到2002年末，上述兩者總數將進一步上升到1400萬人左右，而且，整個「十五」期間的失業率都將呈現上升趨勢。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透露：「十五」期間，失業率將上升到5%左右。同期間，農村剩餘勞

動力有1.5億左右，其中向非農領域轉移的勞動力有4千萬人，城鎮的就業壓力將明顯加大。《文匯報》同時還說，「特別需要指出的，官方公佈的失業率與人們生活中感覺的失業情況相差甚遠。這是因為官方統計中，下崗人員沒有與原企業終止勞動關係的不算失業，因此不進入統計。專家估計，中國實際的失業率不會低於10%。」「從地區看，老工業基地下崗工人較多的東北地區，勞動力供求關係最為緊張，就業壓力尤其嚴峻。」<10>事實上，中國許多學者專家在年前已估算到實際失業率達到20%左右（胡鞍鋼不久前也差不多如此提出），只是官方一直玩弄數字遊戲，許多年來都說是3%至3.5%左右。

工人抗爭湧起

國有企業在爭相裁員，把損失推在工人身上。例如，4大國有銀行裁了20萬員工；遼寧省全省有51萬國企職工被解除了與企業的關係：這是該省省長薄熙來在記者會上說的。而且，該省作為社會保障推行的試點之一，全年社保費160億元，缺口有40至50億元。<11>

實際上，據《明報》記者奔赴東北3省採訪所得，作為工業大省的遼寧，因大批重工業工廠倒閉、破產，已有半數工人失業，民間流傳實際有8成工人下崗。據去年度的官方統計，全省下崗職工、離退休人員總數達50萬人，約佔全國的1成；吉林省、黑龍江省的經濟近10年來均陷入停滯甚至衰退的邊緣，而且還在惡化。下崗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企業每月發予工人百多元至數百元不等，但大多都被拖欠。<12>

龐大職工在遭受裁員打擊的同時，還加上被拖欠工資的困難。財政部長報告，根據地方上報的數字，截至01年底，縣鄉欠幹部、職工的工資是65億元。但《北京晚報》報道，據在建有工會的單位中統計，2000年全國共拖欠職工工資達366.9億元。近兩年，北京市勞動爭議急劇增加，2000年共發生7480件，比上一年增加42.9%。01年1至9月，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而且這種趨勢至今不能遏制。<13>而蕭揚在上述報告中，也說全年共審結勞動爭議案100440件，比上年上升了33%。

同時，向當局上訪（即投訴、請願甚至抗議）的次數也激劇增加。據筆者從英國廣播電台3月10日由香港電台轉播的《時事一週》節目中，似乎聽到時事

評論員劉銳紹說，去年上訪的次數，從上年的9千宗劇增到9萬宗左右。如果筆者沒有聽錯，這樣的劇增是非常驚人的。它反映出中國社會矛盾的急劇尖銳化。最高檢察長韓杼濱報告「全年共辦理群眾來信來訪65萬多件次，這當中便可能包括有上述的上訪。」

在下崗失業工人走投無路、生活日益困苦的時候，在工資、遣散費等被長久拖欠的時候，他們便唯有採取罷工、上街示威抗議、堵塞交通、包圍政府辦公大樓等行動。單是今年3月以來，便發生有下述的工人示威抗議行動：過去為中共號召全國工業學習榜樣的大慶油田，本為國企模範，原有職工29萬人，已有7萬人下崗，其中5萬人為了追討醫療、退休福利舉行的示威，開始於3月1日，至今已持續了3個多星期，參加人數日增；遼寧省遼寧市國企工人從3月11日開始，連日包圍政府辦公樓，進行抗議，有時高達3萬多來自20間國企的工人參加；黑龍江省撫順市煤礦下崗工人也在3月中上街示威。他們除了要求發放拖欠了的工資、保障基本福利、或者要求恢復工作權利之外，還指責政府官員腐敗、賤價出賣國有資產而中飽私囊，等等；新疆省烏魯木齊十月拖拉機廠數千名工人，3月11日前後上街，反對國有的廠房和廠地被賤賣、工齡被賣斷，要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等等。

東北的工潮澎湃未息，首都北京也發生工人上街抗議了。北京汽車製造廠200多名退休工人，從3月27日起在該廠外示威，抗議該廠未按時支付退休金，並指房屋津貼金額不足，他們聲稱已多次向廠管理層投訴，但一直無回應，部份工人已經幾個月沒有收過退休金，因而激發起他們行動起來爭取合理權益。

此外，西北地區也有請願事件，其中甘肅、青海等省份即達近百次。東北的逾千人請願事件近20宗，數十人或上百人的抗議行動多至難於統計。

以上引述的，只是見諸香港報章的部份；其他未被透露出來的同類行動，相信仍會有很多。但就是上面舉出的，也顯現出群眾鬥爭已有長足的復興和進步。

重大的進步性

這次的大規模工潮和群眾行動，具有罕見的進步性和特點，那就是：他們跨行業、多工廠聯合行動，而且很有組織性、政治醒覺性。據《明報》記者的實地採訪獲悉，內地工人已出現組織獨立工會的苗頭，

他們各自成立了臨時工會組織，大慶工人成立的名為「大慶石油管理局買斷工齡職工臨時工會委員會」，並選出工人代表。遼陽成立的名為「遼鐵全體破產失業職工」的臨時組織，並推選姚福信等代表與政府談判。他們以組織的名義發表公開信，各廠職工選出的代表互有會面聯繫。他們要求人大批准人權公約中「組織獨立工會」的條款，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有集體談判權。他們除了提出「要飯吃」的訴求外，也要求政府懲治貪官腐敗。

中共當局面對著這樣大的抗議請願浪潮，一方面採取強硬的手段，拘禁了一些工人代表；另一方面則安撫部份下崗工人，進行疏導，並嚴防示威工人跨省跨行業聯手。<14>

現時的這種發展，反映出中國社會矛盾的高度尖銳化，局勢的動盪不安，官方對現時的困難和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辦法。這正是中共對外開放、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等政策所加劇的。隨著這些政策的更加推行和入世帶來的惡果進一步顯現，失業更加嚴重，社會矛盾更為加劇，貧富懸殊更加擴大，廣大工人群眾的生活更加困苦，則他們的爭取權益抗爭行動便勢將再次興起——假如這次的各地鬥爭被暫時緩和了下去的話。到那時候，他們這次積累著的重要鬥爭方法和經驗，將會幫助他們爭取得巨大的勝利。

2002年3月28日

註釋：

- <1> 3月5日《蘋果日報》載新華社電。
- <2> 3月16日《星島日報》載該報記者特稿。
- <3> 3月9日《文匯報》載中新社北京8日電。
- <4> 3月16日《文匯報》載朱鎔基記者會答問全文。
- <5> 詳見3月21日《蘋果日報》論壇的《缺民主政體入世危機重重》一文。
- <6> 請參看《十月評論》01年第1期該信摘要。
- <7> 3月11日《星島日報》
- <8> 1月28日《明報》、《星島日報》轉載新華網報道。
- <9> 3月8日《文匯報》。
- <10> 3月5日《文匯報》。
- <11> 3月11日《星島日報》。
- <12> 見3月27日《明報》。
- <13> 01年12月17日《文匯報》。
- <14> 同見3月28日《明報》。

(轉載)

來自大慶的報告

林瑾(大慶)

買斷工人的情緒

20號在鐵人廣場上一位40幾歲工人對我說，他買斷工齡後得了十一萬元，2001年交了2800元醫療和養老二級（另有一級保險，需交3600元）保險，今年最少需交4100元，最高交1萬元。他兩年來一直在家呆著，找不到活幹。“（買斷）就是個騙局”，他說。另一53歲工人說，他老婆沒工作，因生孩子晚，孩子仍在中學念書。他兩口子改吃兩餐省錢。現在每天跑廣場，來回車費4元，他把上午飯也省了。他說“我會堅持到底，沒招兒了”。一個40多歲女工向我借筆抄詩“鐵人十罵”，攀談起來。她說當初她的廠領導先是說“不買斷就下崗”，然後放了一周假不給工資。她回去一看基層領導全不認識，廠領導只要大家簽買斷合同。有人說“我回家跟老公商量商量”，廠領導不讓。簽字時有當場哭的，有說“比黃世仁還毒”的。廠領導不吭聲。一老工人說，廣場上好多黨員，買斷工人裏起碼幾千共產黨員。都過不了組織生活，有一年無法交黨費的，因為管理局鐵了心跟買斷工人脫鉤。一工人說，當初大會戰，吃的是帶冰茬的饅頭，住的是乾打壘，十月份工地就凍得像鐵塊，鑽井都靠手工，是拿人肉換石油。現在一句“減員增效”就把我們當包袱甩了，這心裏沒法平衡。另一工人說，“減員增效”是減我們工人，增他們的效益，辦公大樓養著那麼多閑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下崗就是我們下，這裏一磚一瓦都是我們的血汗，大慶石油管理局局長曾玉康現在說我們是社會閑散人員。

令買斷職工普遍不滿的，還有日益嚴重的青年失業問題。自1996年開始，市內專科、技校畢業生不分配。許多買斷職工和在職職工家裏都有孩子失業。管理局每次招工幾十上百人，報名的幾千幾萬人都有。報名費50元，招不上也不退。一位50多歲買斷職工說，他家裏愛人、大兒子還上班，他本人跑點買賣，所以儘管二兒子、二兒媳都在去年下崗，生活

還過得去。不少人同意買斷就是因為怕下崗，想拿這幾萬塊幹點事，但大部分都賠了錢。許多人買了汽車搞運輸，結果往往攬不到活，車被撞、被偷搶的倒不少。這位職工說，現在絕大多數人並沒到揭不開鍋的程度，爭的也不是一時之利，而是長久的待遇，所以大家支持得住。他說，89年學生運動夭折了，我覺得我們夭折不了。他說，在大慶有四股不滿力量，一是買斷職工，已經出來了，二是失業青年，三是老工人家屬，還是大集體(企業)工人身份，不給轉成正式工，也沒什麼福利。四是法輪功。買斷職工暫時還不想號召這些力量。2000年11月20號一次買斷五萬多人。第二年又有三萬人。曾玉康在當時口頭答應“買斷職工到退休年齡後享受石油管理局職工退休待遇”，但這一條（據工人自己承認）並未寫入買斷合同。大慶工人對“領導講話”之類中共官僚傳統工作方式仍較信任，石油管理局正是利用這一點設置了一個大騙局。僅退休金一項，每年管理局可以少支付人民幣十億元。

工人的要求

大慶油田責任有限公司買斷全體同胞在2002年3月18日提出：

1. 強烈要求取消買斷政策。
2. 參照市政辦法，給年齡較大的買斷職工和幹部提前辦理退休手續。
3. 35歲以下買斷職工和殘疾人（因工傷下崗人員一我注）返崗上班。
4. 對單職工的家屬在房改等方面增加補助費、生活費。
5. 採取慎重態度解決待業青年就業問題，特別是年齡較大的待業青年就業問題。

3月20日又提出：

強烈要求大慶石油管理局、大慶油田責任有限公司主要領導同買斷職工代表正當對話：

1. 還我代表上訪合法權利，不准監控。

2. 強烈要求同買斷職工代表正當對話。
3. 必需保護代表正當對話的權利、責任、義務和安全。
4. 代表對話時的意見和要求必需傳達到買斷全體同胞。
5. 不按要求出現後果，全部由大慶石油管理局、大慶油田責任有限公司主要領導負責。

關於組織問題

20-21兩日我在鐵人廣場沒見到任何以組織名義（如中國勞工通訊提到的“大慶石油管理局買斷工齡職工臨時工會委員會”）發表的文字。更沒有人以任何組織名義公開活動。廣場上20號約有3-5千，21號有7-8千人，但沒有維持秩序的糾察。絕大部分張貼的小字報和傳單（並不多）是手寫，20號曾有某“處級買斷幹部”講演，不用擴音器，一女工說“買了個話筒，（公安）不讓用”。她說前幾天打的標語和橫幅現在不敢拿出來。但從某些跡象看，確有組織。據工人介紹，17-19日曾有大規模游行，從管理局大樓到7-8里外的鐵路上，19日曾刮花一些管理局院內的高級轎車，衝進管理局的檔案室。一工人說：“這叫隔三差五弄個小動靜”。另一買斷職工說，上星期“我們（在鐵人廣場）弄了個小紙條，說是攔（經過

大慶的）國際列車。結果（市裏）調了大批武警去鐵路線，我們（買斷職工）沒一個人露面，就是敲敲打打他們”。有人說大慶市內主要企業也貼有小字報。但我未見過。20號發生撞人事件後，有工人跟傷者去醫院。三月初的幾個對話代表現在不見了，目前管理局也不同工人對話，至少沒有公開的對話。

關於20號的撞人事件

20號在鐵人廣場側的大慶日報社門前發生汽車撞向群眾事件，幾人受傷，司機被工人毆打。21號廣場上的廣播車宣讀了市公安局通告。通告說撞人司機名叫朱大勇，34歲，買斷職工（特別強調的語氣），現已對他刑事拘留，並對“毆打朱大勇、砸車一案繼續調查”。群眾反應不一，多認為是當局雇他幹的。

我的看法是：

1. 這次事件看來是一些老職工、老黨員因不滿大慶石油管理局、油田責任有限公司推出的精瘦企業政策而發起的。他們用的完全是傳統的政治語言，目標是維持職工的原有的福利。

2. 在職職工暫未聲援，但肯定關心，因為他們有下崗危機。另外在職與買斷職工大都有親戚關係。大慶市裏很平靜，沒有89年那種激動氣氛。

2002年3月22日

傳單1——買斷工人懷念領袖毛澤東（節選）

全體買斷工友同胞們！

憶往夕，我們懷著一顆顆年青人的火熱心情，踏上了這片荒無人煙的邊陲北大荒。那時我們年輕、美麗、有生氣、有力氣，爲了摘掉“貧油大國”的帽子，懷著對黨中央、毛主席的一片忠心，與荒原斗，與沼澤斗，與蚊蟲斗……

而現在石油管理局的主要領導，每月拿著國家高額工資不算，一連都拿著最高的獎金，半年抽個頭，年終還要拿幾十萬的獎金。我們要問現在國務院總理一年才拿多少錢？他們違背江主席“三個代表”的意願，對上級報喜不報憂，說“大慶沒有待業青年，大慶多少年來就不存在大集體工人了，買斷工人都操起個體經營的大業，大慶人民生活美滿，社會安定，治

安良好”。他們不擇手段地欺上瞞下，坑民，害民，罪不容恕。

蘇樹林（大慶油田責任有限公司總經理）曾玉康是地地道道的大政治騙子，大慶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油田電視新聞的一幕：曾玉康在代表石油管理局“關於在職職工和退養職工買斷工齡的說明”的政策性講話中說：“現在局裏經多渠道請示匯報，費盡周折，在上邊給你們爭取了這筆來之不易的獎金。也可以說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如果現在不把握這次機會，就過這村沒這店了。如現在不買斷，將來企業要做新的調整，局裏要裁減一半職工。如果你們不買斷，企業效益不好，開不出工資就沒人負責你們了。將來下崗也就是你們這個年齡段的，另發兩百元生活費，三

年後連生活費都沒有了，直接推向社會。到時別說沒給你們機會，可別怪我們”。

局主管領導在召集二級單位領導會議時更是給處級幹部大加砒碼，大力鼓吹恐慌症，威逼感，變本加厲讓各級領導對工人施加壓力，逼迫買斷。到今天反而倒打一耙，說是工人自願申請的。我們要問，哪有一個工人向你們請過這個愿？合同（指買斷工齡合同）裏哪有一條是工人寫進去的？哪條哪款是經過工人討論寫進合同內容裏的？合同必須是權利與義務公平對等，相等相稱的，才是完備合理有效的合同，否則一面倒的合同，強加型的合同，就是無效的合同。

買斷工友同胞們！！

一．（石油管理局的）二級單位同我們簽定的合

同，從今天起正式作廢。合同正本內容無法律效力。它（二級單位）根本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公證書不是合同主體，公証無效。

二．管理局下發的2000117、2000118號文件，同合同主體不符，不具有法律行為和法律效力一說，純屬企業不正當的一種行為，宣布失效。

三．強烈要求石油管理局正確對待買斷工人，同在職職工享受一樣的待遇，住房取暖、（煤氣）罐補的一切待遇，直至到退休年齡。

四．強烈要求管理局慎重從事，立即放人。

2002年3月6日

（原注：本文經一定刪削後，已送省政府抄件兩份）。

傳單2——大慶工人民謠

（一）“鐵人”十罵¹

一罵混蛋曾玉康，編制文件搞下崗。欺騙誘導逼買斷，美其名曰是補償。
二罵混蛋曾玉康，買斷大軍聚廣場。我的心裏在淌血，八萬職工太傷心。
三罵混蛋曾玉康，我栽樹來你乘涼。馬打江山狗坐殿，買斷大軍豈能讓？
四罵混蛋曾玉康，子女就業耍花槍。下崗之後低薪聘²，創造效益飽私囊。
五罵混蛋曾玉康，黨的宗旨你不講。全心全意為人民，老毛教誨全忘光。
六罵混蛋曾玉康，三個有利你不講。改革為國更為民，老鄧初衷在何方？
七罵混蛋曾玉康，三個代表你不講。水能載舟亦覆舟，老江指示你都忘。
八罵混蛋曾玉康，後悔女兒嫁給狼³。不是看在我面子，現在怎能當局長。
九罵混蛋曾玉康，缺德腐敗把官當。調換位置想一想，難道良心喂了狼？
十罵混蛋曾玉康，不為老夫我著想。有錯如果不糾正，絕對沒有好下場！

（二）石油工人天不怕

石油工人天不怕，地球鑽出石油花。爲了摘掉貧油帽，人拉肩抗帶滾爬。
盼得東方出紅日，流血流汗成大廈。牛打江山鼠竊殿，領導一年發了家。
老來都是夕陽紅，暈頭轉向滾回家。今天醒來已經晚，被騙已成要飯花。
鐵人振臂一聲吼，還我工人一個家！

注：

1 “鐵人”就是王進喜，深得人心的原大慶石油單位一把手，1970年去世。曾玉康是現任大慶石油管理局局長。

2 下崗之後低薪聘”指近年下崗青工有時以較原薪（1300-1700元/月）低一半的工資聘回。

3 “後悔女兒嫁給狼”：曾玉康是王進喜的女婿。

關於「統計腐敗」問題

軍行

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官方公佈的各種統計數字，存在嚴重的不盡不實、弄虛作假、隱瞞謊報等問題，一直受到國內外公眾的懷疑、指責，失去其應該具有的公信力。這種情況，幾十年來沒有根本改變。

統計上的腐敗

去年12月15日《北京青年報》報道：當時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統計局長會上，就以「統計腐敗」問題作為主要話題，要加以阻擊、遏止。全國各級統計、監察、司法等部門聯合開展了全國《統計法》執法情況大檢查，查處統計違法行為6萬2千多起，其中立案查處1萬9千多件。截至01年10月底，已經結案1萬3千多件。

這樣的透露及其數字的巨大，是過去所罕見的。而「統計腐敗」這個名詞，也似乎是筆者至今從未聽到、見到的——除了官僚腐敗、政治腐敗等傳統性腐敗之外。

《北京青年報》在同日發表了《今日社評》指出：「『會計玩鬼，統計滲水』，在中國儼然已成頑症。……可以說，與『會計玩鬼』現象相類似，以『統計腐敗』為代表的『統計滲水』現象，已經嚴重損害了政府在社會公眾中的信譽與權威，到了必須下大力氣予以根治不可的地步。」

「從制度上……使那些明顯與實際情況相差十萬八千里的滲水數據在科學的統計體系、統計方法面前原形畢露，使那些習慣指令統計人員根據需要隨心所欲地在統計數據上動手腳的幹部再也不能如願以償，這……都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屢打不絕」的原因

為什麼中國竟然長期存有這種錯誤？「『統計腐敗』之所以屢打不絕，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在不少地方，各種統計數字成了對幹部政績考核的重要依據，『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已經發展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官場遊戲規則；所謂『假不責眾』心態、『根子在上面』心態、『跟著前任學』心態、『誰不造假誰吃虧』心態等等，說到底都是一些地方領導在這種遊戲規則下自覺不自覺養成的應對技巧。……久而久之，統計造假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這就等於承認了：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包括經濟增長數字，有許多都是虛報浮誇、不可靠的。

實際上，「統計腐敗」正是官僚制度腐敗的產物和擴展，主要根源在於中共和國家的官僚制度，在這種官僚制度下，國家官員不是由人民民主選舉產生，而是由

中共高層領導所指派，官員幹部本身擁有政治經濟特權，完全脫離了群眾的監督，人民也無權力罷免、撤換那些腐敗無能的官僚。儘管這篇社評提出：「必須通過體制改革，對『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動大手術，把領導幹部的考核和任用真正建立在群眾信任與法定程序選任的基礎上……『統計腐敗』才可望得到根治。」但它仍然不是指政治體制的徹底改革，而只是指國際慣例的統計制度、核算體系和方法等的改革；官員選任的法定程序，還不是指由人民民主選舉和罷免，而仍然是按照中共高層的意旨來制定實施的。一向的政治制度沒有根本改變，則這些統計腐敗情況也將不會得到根治。中共仍會按照其政治需要，用編造、誇大或隱瞞等手段，去制定、宣佈數據。

何以要作部份統計改革？

現時之作出上述的承認和部份的統計改革，直接原因是由於入世後要與國際接軌，以及受到國際上對中國統計造假的質疑和要求真確數字的壓力。這從中國有關官員的如下說話可反映出來：

其一是：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隨後在北京統計工作會上做了題為《中國入世對統計的影響》的報告，他指出，入世後，暗箱操作、缺乏監督的統計活動將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統計的數據、方法、範圍、樣本、由誰來操作等具體問題都將向公眾公佈。統計工作將在社會的監督下進行。統計透明度的改善還包括公眾獲取統計信息的渠道和途徑。「入世對統計的影響十分深刻和深遠。」入世後，國際間的比較會增多，無論是採取聯合國推薦的辦法還是國際貨幣組織的統計方法，統計數據將會考慮增強國際間的可比性。（2月7日《北京青年報》報道）

其二是：統計局設計管理司副司長魏貴祥介紹，改革的重點在工農業生產發展速度的計算方法上，將改變老的方法，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同一商品都以同一價格計量，不考慮價格因素的變化。（見《北京青年報》的12月15日報道）

上引兩名負責部門官員的話，反映出他們也承認一直以來的統計工作和方法是有錯失、不準確的。這也就是說，統計出來的許多數字是不準確的。但單是在統計方法上作改革，而依然沒有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去保障人民行使其有效監督的權力，則舊把戲仍必然會重演的。

2002年2月28日

又一宗煙花爆炸大慘劇！

微波

多年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推行、利潤掛帥，各企業為追求盡可能多的利潤，安全生產設備既缺少或者簡陋，又大量僱用廉價童工、民工，每日12小時甚至超時工作，等等，更加罔顧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加上地方官僚幹部腐敗無能，基層管治能力又薄弱……這許多因素便導致工人工傷以至死亡的事故頻密發生。煙花爆竹廠屢屢發生爆炸，便是其中常見而且傷亡很多的事例。

2001年3月，江西省萬載縣芳林村小學因學生製造煙花發生特大爆炸，死41人傷27人，震驚了國內外。同年12月30日，同一萬載縣，又發生黃茅鎮港資攀達煙花公司的煙花爆炸事件。爆炸發生後，有關當局又是和其他地方發生事故的應對處理手法相類似：初則力圖封鎖新聞，減低事件的嚴重性，掩飾真相；瞞報不成也想少報傷亡損失數字，推卸應負責任，以受害的已死者作替罪羊，拒不承認領導錯誤和汲取教訓，以改善安全設備措施……。這次的具體表現是：

官僚的應對手法

一、盡力封鎖新聞。直屬共青團的《中國青年報》今年1月5日起，幾日內以《「封鎖」與反「封鎖」新聞戰》為題，報道了當地有關部門與新聞媒體之間的一場「戰鬥」。它指出，事發當天，中央駐贛新聞單位得到有關方面通知，〔除新華社外〕不要去現場。當天下午，離現場10公里外，通往黃茅鎮的道路實行交通管制。除新華社和江西主要傳媒記者外，其他媒體記者不得進行採訪。設法進入了現場的《羊城晚報》記者也因報社領導接了廣東省委宣傳部傳真而要求記者撤回。

事件發生後第5天，《中國青年報》記者進入現場，又遭到當地有關部門人員的粗暴阻撓，推離現場，後來幸得一些農民保護，並告訴有關情況。次日，他們到醫院採訪爆炸事故的傷者，又被便衣公安粗暴干涉。經過記者們的堅持鬥爭，得到許多民眾的

幫助和提供信息，他們才能作出了有關的報道。

二、試圖少報死亡人數。江西有關部門當日向媒體公佈的傷亡人數是：死9人，傷60餘人。那時，有些媒體的報道則是死了100多人。3日後，官方再公佈新的傷亡數字是：死14人，因傷住院61人。《中國青年報》記者檢討媒體報道死亡人數有失誤，原因是有關部門對記者採訪設置重重障礙，權威新聞源缺乏，無法核實；同時，有些新聞採訪不深入，對聽到的消息未進行多方核實。而據該報記者的頭幾天查核，相信官方後來的死傷數字是比較準確的。〈1〉據本文筆者了解，這次爆炸發生後，因事件已曝光，縣領導人趕到現場，鑒於5個月前廣西南丹礦廠發生特大死傷慘劇隱瞞了半月，為記者揭發後有關責任人遭到嚴懲，因而不能不公開宣佈情況，雖然初時也少報了死者數字。

三、定性為意外事件，以犧牲者為替罪羊，推卸自己責任。當地有關部門宣稱，事故原因是由於禮花彈廠車間裝彈工潘小華在敲裝藥筒時用力過猛引起連續爆炸，因而屬於意外。這個說法遭到社會上和報章的許多質疑。比如，熟練工人如何會犯低級錯誤？當場被炸死的潘小華怎麼能開口解說和認錯？業內人士更指出，煙花生產時藥劑配方、操作規程等有嚴格要求。如果說真的因為在敲裝藥筒時用力過猛導致爆炸，就說明所用的炸藥計量超標，或者是使用禁用的藥品所導致，應該說這根本不是意外原因，而是因為違反管理規定和操作規程遲早要發生的事。另一方面，據報道，廠區的地下火藥倉存著30多噸的亮珠，這是嚴重違反炸藥儲存規定的，這些應該從廠方違反規定和當地政府監管不力上找原因。〈2〉

《工人日報》在1月7日也發表評論文章，題為《我們不能接受「意外」》，它質疑當地政府不去調查是否有監管不力等原因，卻以「意外事故」來蓋棺論定，如此做法，「能不能給群眾一個滿意的交代？難道讓一個死者來扛起所有的責任？」它又指責當地官員「企圖掩蓋真相的做法」。〈3〉

停產煙花的矛盾取捨

在這次重大事故發生後，新華社南昌1月9日電報道：江西省委、省政府痛下決心，要求全省工業企業兩年內陸續退出煙花爆竹產業。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說：「我們絕不能把全省經濟發展的大廈建立在高危產業的基礎上。」<4>

不過，這項消息在萬載縣引起激烈反響，全縣400多家煙花廠商和工人奔走串連，決定在1月14日到宜春市集會請願。還有廠商威脅，「如果新縣長敢這麼做，全縣人會立即將他趕出萬載！」在這樣的壓力下，新的縣委書記和縣長們於是否認曾說過或作過那個決定，省委宣傳部官員甚至直斥新華社「兩年退出」的報道「純屬失實」。省經貿廳官員則指「兩年退出」只是設想，並無下過文件，也沒有退出的時間表。<5>

《人民日報》也對此問題間接地表態。它在1月15日的《經濟時評》欄內，刊出署名高志國的《停產煙花請三思》一文，文內含蓄地批評了江西省「兩年退出」做法的「矯枉過正」、「一刀切」，而「我們的確沒看到與此相關的善後舉措。」該文作者想，「如果政府相關部門的能動性充分發揮的話，將煙花爆竹生產的危險成份降低到安全限度內，應該是可行的。」可是，作者並沒有具體說明有什麼能夠安全生產它們的辦法和把握，也與它承認「煙花爆竹的確是高危產業」多少是矛盾的。

新任江西省長黃智權，會同省委書記孟建柱，於3月13日在北京向採訪兩會的記者說，該省將逐步地有序地穩妥地把煙花爆竹業從經濟中退出。在2001年，不符合安全生產條件的這樣的小作坊已關掉了60679家。<6>這表示，上引的中共官方報道有關政策和官員發言，是前後矛盾、反覆不定的，反映出人們在市場經濟利潤與大眾安全之間的矛盾取捨。

必需有人民和輿論的監察

幸虧有許多媒體和廣大新聞工作者的努力發掘、追蹤新聞，揭露和報道給社會大眾，使得各級官僚的失職、錯誤受到某種程度的輿論監督，比以前較難於隱瞞真相。這次的黃茅鎮煙花廠爆炸事故中的反封鎖鬥爭，就是近幾年來出現的這類事例之一。

國家經貿委主任李榮融在兩會記者會上說，感謝

傳媒揭露安全生產的事故，使得地方政府瞞報的現象下降了。2001年，全國重大安全生產事故（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有140宗，比2000年下降18%；死亡人數2556人，同比下降超過27%。他同時說，由於以前地方政府瞞報或少報死傷數字（因為國務院規定，要追究重大事故所在地區官員的責任），所以2001年的實際數字比前年應是減少了的。<7>這就表明，如果傳媒或記者沒加以曝光的去年事故傷亡數字，地方政府便可瞞報，而統計總數也更不完整了。

根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早前公佈，2001年1至11月，全國共發生傷亡事故94萬多宗，死亡11.6萬多人<8>（如加上12月數字，並以1/12計，則會分別約為102萬多宗和12.6萬多人），但在2000年，則大約為10萬多人，由此可見，2001年的死傷數字是大增了的。

這樣的增加，應該是由於本文開頭所指出的各種原因，它又一次表明了：追逐市場經濟利潤，會給生產者以至社會大眾的生命、健康及財產帶來巨大損害。

2002年3月18日

註釋：

- <1> 見《中國青年報》1月7日的《為什麼謠言滿天飛》報道。
- <2> 1月7日《北京青年報》。
- <3> 轉引自1月8日《蘋果日報》。
- <4> 1月10日《北京青年報》。
- <5> 2月26日《明報》。
- <6> 3月14日《星島日報》。
- <7> 3月9日《星島日報》。
- <8> 同日《蘋果日報》。



阿根廷人民起義

露西達

在我們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被推翻了，這不是因軍事政變，而是因工人階級和群眾的直接行動而被推翻的。

這次行動並非從平靜的天空上突然來了個晴天霹靂，而是因不滿現存秩序的多重鬥爭以及人民起義為之鋪平道路。

過去的一年是近十年來社會衝突最多的一年。所有這些社會衝突，不僅僅由於失業工人或罷工糾察隊為了得到生活費用，採取群眾行動來堵塞道路，或者迫使政府採取行動來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而引起的，而且還由於在職工人為要求領到未付工資以及維護他們的工作和改善工作條件而引起的。

2001年10月14日的立法選舉，是這次抗議示威的另一種表現。在一個帶強制性投票選舉的國家裡，約有650萬人（佔選舉總名冊的26%）棄了權，他們不參加選舉，拒絕行使投票權。損壞了的、受到懷疑的選票超過380萬張（佔21.1%）。由多種多樣候選人所代表的左派，贏得了迄今從未聽說過的150萬張選票（佔6%）。因此幾個較大的政黨失去的選票超過650萬張以上。

多年來，一直在醞釀著的代表制危機最終成熟了，結果政權喪失了它的合法性。

2001年12月14日至17日，在國家體制的框架之外舉行了人民投票，這次投票是由阿根廷勞動中心（CTA）的總工會和某幾個社會、政治團體共同組織起來的，這些社會、政治團體聯合參加反對貧窮全國陣線，為失業家庭成員採取到一個新的綱領。約有300萬人投了票，表示支持全國陣線提出的新綱領。

全國人民面對壓倒性的經濟危機，並且不信任各政黨及「代議制民主」的體制，他們的政治覺悟達到成熟階段，而且終得必須把解決問題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社會爆炸了

下列三種因素的相互結合，在2001年12月20

日——21日的社會爆炸中體現出來了。一個政府如果不能應付危機，不能繼續支付非法的外債及其利息，就只得採取凍結銀行存款以及部份地征用工人的工資。在銀行系統的配合下，政府最終決定切斷一切資金支付——把相等於商品流通總額的貨幣從市場上退出，實際上，這就使所有的商業和金融活動癱瘓下來了。

社會上的反應不是遲滯的，而是迅速地跟上來，在失業率高、極端貧困的行政區和其他地區，成千上萬人民由於被排除在生產之外，又無能力消費，便包圍了大型超市連鎖店，要求得到食品。如果他們得不到食品，立即把超市周圍的圍牆推倒，自行奪取食品。大規模的貨棧、倉庫多年來以它們自己的方法掠奪國家資財，這次也被群眾沒收其貨物了。掠奪的行為還擴大到小商店，有人懷疑，這場貧民自相殘殺的戰爭，還得到極端反動部門的鼓勵。

國家宣佈處於緊急狀態，總統的演說言之無物卻又妄自尊大，自然而然地促使聯邦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發生更加強烈的反應。首先，人們在自己住房的大門外，然後在主要的通道上憤怒地敲響他們的平底鍋，最後則衝向各主要街道，一大群男男女女、勞動人民、機關職員、家庭主婦、學生、退休人員、專業人員以及小業主們一起聚集在最富有象徵性的梅奧廣場。儘管生活費用高漲——那些對此應負主要責任的官員們必須受到法律懲處——市民們卻向那無力控制社會起義的國家提出挑戰。首先，12月20-21日清晨，有4萬以上人民要求經濟部長辭職，然後要求總統辭職，最後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滾開」，這顯然指的是制訂國家制度的一切人。

更具有象徵性的行動是：好幾家銀行總行、多國公司、自動櫃員機所在地以及某幾個政客們的住宅，都成了群眾疾苦怨恨的發洩地。

政府的垮台，表明群眾首創性和直接行動的勝利。被剝削者、被壓迫者、被排除者已經行動起來，真正把政治權力抓到手，恢復了他們自己的權力和自

群眾運動

治，而幾十年來所有這一切都被各政黨和國家機關所剝奪了。這次起義的結果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人鼓舞的了。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投票決定的領袖們的號召，已在具體的行動中看到了。

左派積極參與總動員。但由於人數少，或由於並不了解已在現實生活中形成的非代議制的辯證法，他們的參與還不能起到決定性作用，阿根廷的三個主要工會：總工會（CGT）、「抗爭」總工會（「Rebel」CGT）和工人中心總工會（CTA）曾經正式宣佈罷工，但並沒有動員工會會員積極參加群眾行動，僅僅在行動中露了面，然後便迅速離開了。以CGT為例，他們的結果是與各不同的權力派系妥協了。至於CTA（勞動中心總工會）既缺乏市民精神和膽量，又沒有明確的政治方針。

起義了的群眾運動正在向前推進，他們懂得什麼是不需要的，什麼是不可接受的，什麼要予以拒絕，但他們仍然不懂得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因而再一次留下空間，而被現有的政治異己者所填補，而這些政治異己者是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的。

然而，儘管有了這些限制和不足之處，而新的政治局面在阿根廷已經打開了。有關政治代表性的新形式的爭論或相互討論還在群眾運動中展開，此外，還討論了代表與被代表者之間的新關係，確立了依靠自己進行思考、做出決定並辦一切事務的新階段。

前景是豐富多采的，富有潛力，但困難也同樣存在。有很多問題要依賴更有覺悟性的社會部門來決定，從而加強起義群眾的信心，這首先必須要深化他們領導層的自覺性和提高改革的潛在能力。

（蕭明節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2月號）

革命的日子——阿根廷社會動亂目擊記

柳真譯

〔下文是阿根廷社會主義工人黨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摘要〕

那是一個進程，這個進程捲入了社會上所有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層份，用不同的方法，卻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推翻德·拉盧和卡瓦羅政府。

隨著採用限制儲蓄者向他們的銀行提取存款數量，並且更進一步向退休金和工資進攻，一系列的抗議開始了：小店主敲著盤子發出呼呼聲，封鎖道路，在12月13日，完全支持24小時的總罷工，並在門多沙、安特爾麗沃修、基爾梅斯的超級市場外面示威，這種不滿向前飛躍發展，把12月19日和20日變成革命的節日——一個阿根廷群眾歷史上獨立行動的日子，這個事蹟將寫在以後的歷史裡。

12月19日早上，工人階級最受壓迫的那一部份和群眾走上了政治舞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人口最

稠密的地區和其他11個省，失業的人民和他們的家屬向超級市場進軍，尋找食物。聖誕節的接近和新年是加速起義的因素。一種局勢的徵兆——5百萬失業和就業不足的人民已經在經濟蕭條中被拋在後面。

……這個時期最窮困和令人絕望的社會階層，同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一起，走上了政治舞台。

……「不再挨餓！麵包和工作」是基本的要求……

第二件大事發生在拉盧宣佈以保衛和平為目的的一個國家緊急狀態的法令，即用來嚇唬中產階級和鎮壓搶劫者。到那時候，已經有幾個人被處死了。法令宣佈之後，一個大規模的自發的，主要是中產階級的遊行示威，走上了首都的街頭，這個政治權力中心的街頭，向國家緊急狀態令挑戰，數十萬示威者向瑪約廣場前進，篝火在街角燃燒。在行進中的人群和陽台

上的人群一起敲擊著盤子，發出呼呼的喧鬧聲。司機們響著他們的喇叭。一個真正的人的洪流，向梅奧廣場、國會廣場、甚至卡瓦羅官邸邁進……最頻繁地聽到的口號是：「把國家緊急狀態令貼在你們的屁股上！」「滾蛋，我們不需要你們當中的任何一個！」……

12月20日星期四，隨著瑪約廣場的戰鬥，政府被推翻了。大清早，數千青年工人、失業者、辦事員和學生面對面地對抗警察。青年人擔任決定性的角色。為控制廣場的戰鬥，從上午九時開始持續到深

夜。在警察以清掃廣場為目標，用催淚彈、馬隊、橡膠子彈，有時包圍著、惡毒地攻擊示威群眾的時候，示威者再三地站穩他們的立場。可恥的是，幾個工會、總工會和階級鬥爭戰士都沒有到場。由於抵制遊行示威，他們阻止已組織起來的工人小分隊參加這個戰鬥。

差不多在下午七點鐘，拉盧辭職，從政府大樓的陽台上乘直升飛機逃跑，群眾的政治勝利，結束這些重要的日子。

（譯自《工人國際報》2002年1月號）

兩星期換了五個總統

柳真譯

費爾南多·德·拉盧有失體面地離任之後，阿道爾孚·羅·沙阿（Adolfo R. Saa）被匆忙地挑選出來當看守總統。

上任一個星期之後，他辭職了。他要求他的黨的地區領袖不要支持他曾提出過的緊急狀態措施。

沙阿是公正黨的成員，這個黨聲稱要繼續胡安（Juan）和伊維塔·貝隆（Evita Peron）的民粹派傳統，他曾當過12年的省長。

他宣佈立即延期償還全部外債的本息，戲劇性地宣佈為歷史上最大的拖欠。不管怎樣，由喬治·W·布殊領導的帝國主義政府趕緊祝賀他擔任總統。因此，世界的金融家們明顯地滿懷希望他能夠保護他們的投資。

沙阿宣佈許多戲劇性的措施，討好公眾之反對官僚和腐敗。他削減政府部門，從12個部門減為3個，取消全部的官用轎車和替當領導的政治家提供航班飛機。不管怎樣，他不圖謀開除公務人員。因此，採取這些措施不知道能節省多少金錢。

他限制總統的薪俸為3,000美元。

他允諾許多措施去幫助恢復扶貧的效果，包括為10萬多人創造工作機會，對挨餓的給予食物幫助，並

且增加最低的工資。

他保留比索對美元的貨幣牌價，因此沒有計劃降低比索的價值。可是，許多時事評論員不知道他怎樣會得到足夠的硬貨幣，去滿足要求以無價值的比索去兌換有價值的美元的人民。選擇放棄一美元兌一比索的限價是有吸引力的，因為這會允許比索貶值，並且鼓勵阿根廷的出口。而這樣就要把問題轉移到工業上去，但中產階級卻曾經以美元作銀行貸款去做生意和買了住宅。

沙阿保持前政府控制外幣的交易和銀行業務。當銀行重新開業，阿根廷人發現他們仍然只能一個月提取1,000比索，這就重新引起騷動。因為法院否決解除銀行管制，許多阿根廷人譴責法律制度同政府仍然保持腐敗的關係。

一種「第三貨幣」argentino被採用來代替17種亞貨幣或者票證，已經在流通使用。

面對阿根廷群眾，沙阿不能解答一個單一的主要問題。他所實行的措施也沒有一個能夠滿足金融家或者帝國主義政府，他是他們的政治代表。

他的被迫離任加深了資本主義在阿根廷統治的危機。

兩星期時間內的第五任總統埃·杜哈德（E. Duhalde）進一步確定了阿根廷不履行她的外債義務，並且打破了美元限制。預料比索貶值大約30%，以便能夠使國家的出口和工業得到復甦，但這將要對

小商業和中產階級加強壓力。要解決阿根廷危機，將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譯自《工人國際報》2002年1月號）

阿根廷的經濟危機

柳真譯

阿根廷經濟和社會的爆炸清楚地表明帝國主義所積累給她的內部矛盾。

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重要的製造工業的阿根廷，被西班牙、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者連續不斷地非法剝奪已有許多個世紀了。

這個國家可以看到一天有2000人淪落到貧窮線以下的生活水平，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有過優厚的待遇和合格的專業。阿根廷有1,400萬人的生活不到4美元一天，而他們卻面對擺滿食品和生活消費品的超級市場。

當美國和英國的消費者或多或少受到鼓勵，拿出他們的信用卡無節制地消費，以「挽救」他們國家經濟的時候，阿根廷人卻被告知：他們不得不挨餓，接受政府機構的裁減，達到20%的失業率，政府資助的企業把工資削減13%，和付給過低的報酬，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停付退休金，以便拉盧政府能夠償還它的外債。

阿根廷對帝國主義的依附，體現在長期的貨幣不穩定、對外投資者和銀行拖欠巨額的債務。

在80年代晚期，當物價每個月以兩倍的速度增長時，政府非常嚴格地限定比索對美元的匯率。那就是說，一比索可以兌換一美元，而阿根廷的利率同美國流行的利率是相同的。

這一個措施穩定了貨幣，並且在幾年當中開創了經濟的擴展。可是成本在外國的債務中仍繼續增加。

在1997年標誌太平洋「虎」的經濟的真正弱點，在東南亞已變得很明顯了。泰國、印尼、南韓、台灣、菲律賓和其他國家出現了貨幣大貶值、工廠關

閉、貧困增長和社會政治的不安定。

這些事態的發展在其他「新興的市場」像俄羅斯、巴西引起了危機，當希望繁榮寄託於「新技術」被拋棄成為昂貴的冒牌貨之時，世界貿易遲滯，而最終在2000年走入逆轉時期。

這些問題集中在財政和股票貿易部份，那是巨大的水泵，從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汲取財富進入美國、日本和西歐的銀行金庫裡去。

1998年，巴西一個股票市場的暴跌，使巴西貨幣的價值劇貶。從巴西來的降了價的出口商品是阿根廷的主要競爭者之一，因為貨幣的行市牌價是限定的，阿根廷不能貶低比索的價值來報復，阿根廷的經濟遂走進衰退。

這不僅使阿根廷人失去工作，而且使它喪失了出口利潤。這就是說，這個國家不能如期償付她的美元債務。政府不得不在國外提供更高的利率，以便借得更多的美元來償付已過期而未償清的貸款。

2001年第三季度，阿根廷全國生產總值比上年同期幾乎降低了5%。製造業和建築業降低的數字是7.1%和12.3%。銀行家覺得比索的估價過高，超過了50%。

這個國家很快就債台高築，達到1320億美元。為了把錢都一起積累下來償還債務，激進的總統拉盧採取了一種「零赤字」的政策。嚴厲的措施強制施行了。公職人員的工資削減13%，更多的削減還在威脅著，退休金也要削減，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根本不予支付。

許多阿根廷人實現匯率的限定標準，是在強大壓

力下進行的，並且採取措施把他們的比索兌換成美元，或者在良好的情況下，在國外，把他們的銀行存款換成美元結算。在2001年，有180億美元匯出國外。

政府因此採用了嚴格的金融管制，包括小額提款。同時，國內的利率必須追隨美國的利率。結果政府不能降低利率去支持阿根廷遭遇困難的企業。

拉盧的激進政府使各個社會階層，包括反對它的階層成功地團結。

窮困的專業人員、破產的小商人和零售商、沒有現款的公務人員、挨餓的領取撫恤金的人，和失業的工人及青年群眾，都團結起來要求拒付外債，立即降低比索的價值。

危機的起因，既不在於競爭，也不在於繼任的阿

根廷政府的腐敗。其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通過資本剝削人民的勞動。

利潤取自無償的勞動時間，工人們對生產出商品的貢獻大於他們所得到的工資。

階級鬥爭根源於人們拿取剩餘價值和佔有工人在勞動進程中所生產的商品。這是驅動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這種情況是近幾十年來差不多每一個時事評論員曾經痛苦地隱瞞著的。

但是，集中起來的世界危機，已經把這個因素給世界帶來迫切的關注。它最強有力地表現出阿根廷人民的命運，但帝國主義卻將之歸咎於阿根廷人民和他們抵抗的強大精神。

（柳真譯自《工人國際報》2002年1月號）

阿根廷民眾進一步動員

霍理

阿根廷民眾的社會起義，繼去年12月推翻拉盧政府後，不僅沒有平息，反之更有深化和蔓延的發展。在2002年2月1日，全國各地又有大規模示威，反對最新一任政府人民主義者杜哈德。杜哈德在臨危受命之前，口口聲稱他的心是與民間相連，但他一旦上台，理智卻告訴他，要和之前的總統一樣，站在銀行家和帝國主義一邊。

在今天的阿根廷，群眾示威無日無之，群眾的普遍口號之一，是：「他們全部都要下台！」這個「他們」，是指資產階級政客，而這裡面當然也包括了杜哈德。

2月4日路透社的電訊這樣形容民情：「阿根廷隨時會爆發暴戾的社會動盪，這個素來以歐洲人子裔自傲的民族正備受每日發生的事態衝擊，而這個國家曾經是全拉丁美洲生活標準最高的國家。」這則電訊反映了阿國內部向有的種族主義情緒：阿根廷是歐洲人而不是拉丁美洲人。不過，隨著「自由市場」經濟的海市蜃樓的消失，這種自驕自大的想法也吹破了。

阿根廷一向是人民主義的碉堡，不過，在今天「他們全部都要下台」的口號下，使到素來壟斷政壇和工會的貝隆主義也發生動搖。

街坊組織活躍

正由於工會被官僚嚴密操縱，加上失業高企，致使這次大規模社會示威的主力，是落在鄰舍組織、貧民和失業者身上。而在他們積極行動的壓力下，也使工會不得不有所表現，漸漸發起行動。

阿根廷的托洛茨基派分成幾個組織，不過，他們在組織鄰舍委員會方面則是意見一致。現在，這些鄰舍組織紛立，仿似地方蘇維埃，分佈在大布宜諾斯艾利斯以至全國多個地方。據最大規模的一個托洛茨基主義派別「工人黨」的喉舌報道：「在1月20日，區際議會決定為這場人民運動設立新的政治架構。而在25日，我們發起了繼12月19—20日之後第一次在全國敲鍋遊行大示威，得到全國各地的響應。這個運動在大布宜諾斯艾利斯產生了第一個人民議會。」

而另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喉舌報《民主工人》，呼籲在起義群眾的基礎上成立全國工人及人民代表大會，它說：「號召這個大會的條件和力量已經存在！社會各個戰鬥力量已經發出這個呼籲。」

在托派運動裡，對於是否提出「立憲會議」的口號出現分歧，不過，隨著政治危機日漸深化，一些具體口號已經逐漸確定下來，如撤銷外債、歸還存款給存戶、發回工資和退休金，製造工作機會等。

經歷「全球化」的阿根廷在現時的職位，只能提供給半數的就業人口；由「自由市場」產生的經濟危

機，除了社會主義之外，沒有其他解決出路。前階段的經濟繁榮造就了拉丁美洲最強大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隊伍和最強大的工人組織，這為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

在未來數月，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將遇到歷史的考驗，國際社會主義者有需要密切注視阿根廷局勢的發展，隨時準備建立國際聲援行動，反對阿根廷統治階級的暴力鎮壓。在2001年12月19-20日阿根廷群眾動員中，已知有30人被殺害。

（史丹摘譯自《社會主義行動》2002年2月號）

阿根廷左派新發展

卡茨

〔本文寫在2001年12月阿根廷爆發群眾大示威和連串政局變動之前，為我們對阿國左派的近況提供一些內望。〕

阿根廷左派在2001年10月14日大選中取得空前成績，而且捷報頻頻，在大學選舉中又得到新勝利，並且能夠在國內危機當前組成了一個有共同綱領的左派大聯盟，共同發起了第一次聯合大示威。

在今天的阿根廷，「左派」一詞囊括了社會上所有激進抵抗力量：工會、組織路障者、學生和民主人士，及體現社會主義綱領傳統的各派政黨如共產黨、托派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MST）、「社會主義運動」（MAS）、「工人黨」（PO）、「社會主義工人黨」（OTS）、「自主解放」（AL）、以至毛派等各類社會主義派：「人民工人黨」（PTP）、「阿根廷社會黨」（PSA）及「人道黨」（PH），儘管把最後這個黨納入左派範圍，或許會惹來爭議。

2001年11月16日，左派在三點上達成協議，發表聯合聲明：

1、有需要在「拉盧下台！」和「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口號下制訂政綱，反對政府；

2、提議政府有關於經濟的開支，「不要償還負債」；

3、面向廣大群眾，發動群眾動員：「支持工人群眾所有鬥爭」。

諸如拒絕償還外債這些大眾化的口號，將使左派能夠深入群眾運動。阿根廷左派在今天之增長，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隨著汶南主義沒落，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威望滑落到低潮；與此同時，左派亦在前蘇聯倒台的打擊下逐漸回復元氣。不過，在那個時候，左派對群眾的影響力仍然不及1980年代中其時，也不能與尼加拉瓜革命和巴西工人黨誕生的那些年代並論。不過，阿根廷左派在今天取得的進展，事實是反映了左派在拉丁美洲大選中普遍得利的大氣候，也反映著普遍興起的民眾運動如巴西的無土地農民的直接行動、墨西哥薩巴蒂斯達運動的興起。

新景象

左派今天的新氣象一改從前，那就是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在今天已經不再構成戰略爭議的中心。面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退卻，已經毋須再爭論是否應該把他們納入左派陣線。私營化的「阿根廷工業聯盟」對帝國主義刻意奉迎，又鼓吹把比索貶值，所以很顯然的，已經毋須將之視為有潛力的盟友，就像1970年代由蓋巴特引起的問題。不過，「阿根廷

工人中心總工會」的領導層（CTA）仍然是明目張膽地保留民族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的方案，儘管支持面已日益下降，但在這樣的背景下，還是繼續構成問題，造成很多戰術性爭議，例如該和誰合作、怎樣的行動，等等。幸好這些爭議已經日漸次要，不能妨礙左派得以組成聯盟。在今天，用更突出鮮明的左派立場建立群眾行動大聯盟，已經是很有可能的事。

國際間左派狀況的變化，也是助長阿根廷左派取得進展的成因。現在，當然再沒有前蘇聯時代及毛澤東生前那種誰是左派或不是的爭議，而在那時，一般是根據是否自發地支持古巴以反對美帝國主義，作為劃分左派的標準。在今天，爭議會是圍繞對拉登的定性。不過，這個爭論仍未觸及建立社會主義力量聯盟的對象方面，所以仍未產生大問題。

阿根廷今天的左派多少有點像歐盟一些國家的極左派，即是聯線起來對抗社會民主派，只不過它們仍未在組織方面有突破，但已逐漸建立政治影響力。比起巴西工人黨之從屬在社會民主派的霸權之下，阿根廷的時機已經成熟，能夠建立一個統一的左派前瞻。

左派三大戰略考慮

阿根廷左派結盟在過去有許多重大爭議，那些爭議在在成為障礙，損害左派組成陣線。正如前文所述，其中有些爭議已經成為次要，而在今天繼續存在的，仍有三大方面，構成了三種富建設性的戰略性的爭論和選擇。

第一種選擇是阿國歷來的爭論焦點：有需要建立一個革命黨。這個說法是對應於組織聯合陣線而提出的。這個見解意味要組織一個單一的組織，朝向內望而忽視組織外圍的集體智慧。現在，為組成一個統一左派而鬥爭，可以使各方力量發展一個共同見解，回應當前形勢。

第二種戰略選擇，便是是否把左派統一的全部希望放到工會，即是希望最終使「阿根廷工人中心總工會」完全激進化，變成類似巴西工人黨之類的組合。這個觀點在阿根廷歷史上同樣根深蒂固，不過，人們現在愈來愈看得清楚，「阿根廷工人中心總工會」的政見始終緊隨貝隆主義，偏向民族資產階級而不是社會主義。但雖然這樣，左派在正視這個現實之餘，也看到不同工會有不同的取向，不能一概而論。左派已

經知道，本身必須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才能對「阿根廷工人中心總工會」發揮影響。

第三種戰略，是由一些左派提出，認為應該在近年間興起的反抗運動中建立組織網絡和架構，這些運動包括了堵路運動、佔地運動和一些人權組織。在阿根廷社會裡，有許多充滿戰鬥性的社會組織，通過直接行動的方法挑戰政府。檢視一個左派組織是否有生氣的標準，便是看它介入這些運動的程度。所以，如果僅用這些運動在大選中的得票率來看它們的實力，便是大錯特錯了。不過，也不應該美化這些運動，以為它們是和社會上向有的諸種問題絕緣。例如，這些運動有些是非政治化的，而且一樣會左搖右擺，在左派和貝隆主義的獨裁人物之間截然轉向。

前景樂觀

左派統一的戰略比起前面討論的三種戰略，在爭取社會主義前景方面是更具有進步性和現實性。不過，左派倘要得盡其利，便需要明白和承認上述存在的各種可能性，而且要主動改進文化氣候，使之對左派有利。時至今天，昔日令左派耗損的宗派主義已經大幅減少，但並非完全消失。一些組織已經明白，它們的敵人是資產階級而不是和他們接近、同樣在每日受苦的同志。左派人士之間在討論時使用的語言已經多了互相尊重，儘管仍有好些左派仍然用尋釁的語氣和作風爭論。

阿根廷的政治傳統崇尚政治強人，這一個論題，左派將來也有需要正視。在過去，左派組織俱用：「只應在內部討論分歧意見」而盛行壓制言論。隨著現在大為開放、民主和文明的辯論風氣，左派將能開啓一個具吸引力的空間，為尋找「新人類」的人提供一個榜樣。

多年來，說什麼「我們完蛋了」、「70年代已經逝去」、「社會主義已死」之聲不絕於耳。不過，人們同樣深深記取，革命者是堅忍不拔的梦想家，眼中只有勝利。

（史丹撮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2月號）

從「可疑船」擊沉事件看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

高島義一

2001年12月22日，在東海的中國專屬經濟水域裡，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船用20毫米口徑的機關槍擊沉了一艘「國籍不明」的小型船隻，殺害了至少15名船員。

戰後50多年來，在和平憲法的制約下，日本的國家權力沒有直接在海外行使武力殺害外國人。這一次的20毫米口徑的連發槍擊聲，宣告了日本戰後一個時期的終結。日本的憲法以及相關的法律已經不能約束日本政府，日本軍國主義正式開始支配日本政府而復活，日本已經對亞洲民眾不宜而戰。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柳條溝引爆南滿鐵道，卻誣稱是中國軍隊所為，開始了到戰敗投降為止的全面對華戰爭。日本把「9.18」事件稱為「滿州事變」，稱為關東軍的「專擅獨行」而無法制止。這一次事件卻是日本政府周密計劃的謀殺，以此推動日本修改憲法（刪掉和平條款）、完成向戰爭國家體制的過渡。

據報道，此所謂「可疑船」最初於12月21日下午4時，被自衛隊P3C偵察機發現在離奄美大島西北方向150公里遠的東海公海的海面。按照聯合國的「200海里」相關條款，作為沿岸國的日本對海洋或海底資源具有專屬的開發、利用權。日本的漁業法允許海上保安廳對在日本專屬經濟水域內從事未經許可的捕魚或開發的外國船隻進行檢查。如果違法，這是一個最多判刑為十個月的輕型「犯罪」。

小泉內閣聲稱海上保安廳基於「漁業法」命令該船停航受檢，但海上保安廳自己承認此船不像是漁船，也沒有發現任何「不法行為」。所以，帶有明顯威脅意圖的停船命令本身是不合法的。感受到危險的小船立即逃離日本專屬經濟水域的公海海面。

1999年3月發生過所謂第一次「可疑船事件」。日本選擇兩艘公海上航行的小船作靶子實行修改「防務指南」的預演。在追擊中，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發射1300發20毫米和13毫米口徑的子彈，海上自衛隊的大型巡洋艦、護衛艦發射35發50毫米口徑的炮彈，P3C偵察機投下12枚150公斤重的炸彈。但是，正如當時的內閣官房長官野中所承認：「現行法律不允許在未受到攻擊時發動攻擊。……一定不能直接射擊到船身。」（3月14日記者會上）當時的防衛廳長官也

承認：「因為法律上的關於使用武器的限制，讓可疑船逃掉了。」那是一次真正的「警告射擊」，目的在於使日本公眾知道法律「不允許保衛日本」，以此推動「海上保安廳法」、「自衛隊法」的修改，使日本可以更自由地使用武力。在國會審議通過這些法律修改時，連日本共產黨也投下了可恥的贊成票。

改惡的海上保安廳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在日本領海內外國艦隻有準備重大兇惡犯罪嫌疑且屢次無視停航命令，在抵抗、逃跑時，海上保安廳經過長官批准，可以使用武器。這一次事件發生在日本領海之外，該船也沒有任何犯罪嫌疑。但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在追入中國專屬經濟水域後，竟1次發射數百發子彈，直接射中船尾和船首，使其著火而減慢船速。面對靠攏的3艘巡邏船，小船的船員用步槍奮起自衛還擊，遭到巡邏船186發子彈的命中射擊，立即沉沒下去。日本巡邏船在300米遠處靜觀一個半小時，看著至少15名船員浮出水面後淹死，完全無視聯合國有關海上救難的義務法規。

海上保安廳能這樣無法無天，當然是來自日本政府的預謀。實際上，海上自衛隊的P3C偵察機12月21日下午4時「發現」該船正航行離日本領海最近的地點。該船在從朝鮮西海岸南浦港出發的時候，就被美軍的偵察衛星盯上，並被通報了日本防衛廳。防衛廳18日在種子島西面水域監聽到該船的無線通信。日本拿不出任何證據證明該船從事任何不法行動，只好以「國籍不明的可疑船」稱之。

考慮到這個事件的國際影響，日本必須確切知道這是一艘朝鮮船才敢下手。即使知道了這是一艘朝鮮船，日本也必須花數天的時間才能完成從首相（小泉）、官房長官（福田）、內閣危機管理總監（杉田）、海上保安廳長官（繩野）到具體執行戰鬥的海上保安廳、自衛隊官兵的準備工作。這是一次計劃周到的謀殺，日本保安廳為此準備好錄像，並在死者中撈出兩具沒有槍擊傷口的屍體帶回去解剖以證明是淹死的。如果存在一個真正公正有效的國際法庭的話，從小泉到開槍官兵都應該被送去公審。

據1998年度海上保安廳發行的《海上保安現狀》，97年一年內發現有816隻「可疑船」在日本領海內「游弋」。可以想像，有多的船在日本專屬經濟

水域內的公海上航行並受到日本的監視。日本選擇哪條船作為活靶子，以它的計劃意圖為準。正如99年3月的第一次「可疑船」事件除了實施已經修改過的海上保安廳法外，還進一步包括憲法在內的限制日本在海外用兵的法律，使日本在即將到來的由美軍發動的戰爭中能夠全面投入戰鬥。小泉已經下令準備在下次國會中再修改這些法律。

我們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這次事件，並成立一個調

查委員會，全面、公正地調查這一事件。為此，日本政府首先必須公開所有相關記錄，並向死難船員的親屬道歉、賠償。美國也有義務向國際社會說明它是否參與了預謀；否則，它還有什麼臉面高談「打擊恐怖主義」呢？

（趙京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2年1月14號）

越南近況

洵

〔洵（Tuan）自20世紀50年代晚期以來曾經住在法國，而自1990年起即經常地回越南。讓·米徹爾·克禮文訪問他，談到他最近所見的情況。〕

你在越南三個省旅遊，你注意到同你從前的見聞有許多重大變化嗎？

1997至98年之間，越南成為一個消費的社會。當時，有條件的青年首要的是到國外去賺錢。現在，在這個國家建立的外國公司，尋求本地的管理人員，給予他們豐厚的待遇：在97至98年間，他們的月薪可以拿到200美元，2000年是800美元（平均月薪實是100美元），此外，還可以免費到泰國或者新加坡旅遊，接受「訓練」。

這些年輕人現在要留在越南。從前的夢想是去法國或日本，也有到美國去的，作為中產階級和普通階層重要份子的典型。但是，縱然人們知道好些移民到那裡去的家庭，擁有幾輛轎車和華麗的住房，那也不是這麼多人所希望的天堂。這也是為人所知的：未被承認其資格的越南人是難以找到工作的，甚至在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之間發生種族衝突。

總之，即使現在崇拜美元的思想普遍存在，但與其漂洋過海去掘金，不如在本地賺取。

過渡到市場經濟並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你有這種想法嗎？

從1986-87年起，開放的越南要加入國際社會。它要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的一部份，就引致要抑制越南人民的革命，而且它普遍地贊成總統制。它要參加世貿組織。許多領導人被派到國外，統治層份已經在轉變：一般的部長年齡在50到55歲之間，他們

的顧問、參謀和部門頭頭到處旅行，並且開始反映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影響。

人們能夠公式地識別兩種趨向：保守的趨向——「老前輩」反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青年人的趨向並不那麼拒絕全球化。評論西雅圖示威的書已被翻譯過來了，人們都知道有關ATTAC（致力改造全球財政運動）的情況。

在經濟平面上，比起亞洲四小龍來，越南較少地受到1997年亞洲危機的影響（它沒有股票市場），可是外國的投資減少了。現在優先給予農業（出口大米）和石油，部份利潤來自地區遷移來的（例如台灣來的）已經減退了。在河內附近設想要在那裡建造一座商業中心，建築地盤是停工的。

形勢要求統治者向美國送秋波。克林頓的訪問就被看作是這種秋波；作為一隻跛腳鴨的總統，他事實上是多個國家的一個商業旅行者。幾個月前一個商務協議同美國簽訂了，這個協議在不到兩年之前曾被拒絕過。幾幅歡迎克林頓的橫幅是由通用電氣公司提供的。

在這種背景下，外國語正出現些什麼變化？

曾經被強制學習的俄語現在不興了，英語則日益增長地傳播。在河內，我看見一些商店用英文寫招牌。法語，在操法語的高峰會議之後，也在復興起來。

你注意到任何重大的政治變化嗎？

是的，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大約有三年了。現在老一輩的已經談論到過去，並且提到迄今為止的禁忌問題。例如，民族主義領袖阮安寧（Nguyen An

Ninh音譯），在他2000年9月29日的百年誕辰時被提到，他比阮愛國（後來改為胡志明）的名聲更為顯赫，並且在30年代在《鬥爭報》有一段共產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經歷。1943年，他死於保羅·康多（音譯）的集中營裡。雖然他確實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他絕少談到獨立之後的事：他情願維護胡志明的威望而使自己顯得不重要。此外，他受到殖民主義者的壓制，正像在同時期的，藉秋收（Ta Thu Than）一樣，後者是受人歡迎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領袖，於1945年9月為斯大林主義者所暗殺。說到他，在老人當中會喚起令人傷心的記憶。

然而，他的百年誕辰大會，第一次在胡志明市得到批准。超過200人出席，主要是老年人和黨員。老共產主義者陳文教（Tran Van Giau音譯）發表講話，他淚眼盈盈說：「Ninh教導我以自覺的態度去為革命而鬥爭！」兩年來，有許多書籍曾經引證到他。他的兒子出版一部大書，在書中，他把托洛茨基主義者當作革命者來介紹，同共產黨的觀點不相同。

三年前有許多人談論泰賓（Thai Binh）農民反對腐敗的官僚的事。這個運動有留下什麼痕跡嗎？

我要說！我要給你舉個例子，在胡志明市其中國民議會辦事處對面的行人道，被200人所佔領，他們持久地日夜在那裡，到現在有一年了。他們製造木牌和旗幟上面寫著：「胡志明萬歲！」「越南共產黨萬歲！」而這種行為仍被控告為反對政府，要審判他們。

報章沒有權去採訪他們或為他們說話，大量的便衣警察，包圍著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接近他們拍照，但是我成功地拍了幾張照片。不管怎樣，政府仍得放下武器，因為這些都是為獨立而戰鬥的英雄們的家屬。當局用這種蠻橫的方法，給人民的印象是很壞的。如果越南的報紙對這個問題緘默，亞洲對它的議論就是可信的了。

至於腐敗的問題，單純地生長起來，每個人都是知道的。簽訂任何外國合同，都得先用信封送禮。這種假公濟私的交易，不論哪一個，誰付出最多，誰就成功。關於部長他們自己的事情，我了解的並不多，但是對於他們的隨行人員……我是親眼看見的（這是我的出租汽車司機指給我看的）。豪華奢侈的住所，正在為總理的兒子建造，它比起前總統阮文紹的官邸華麗得多了。

那麼，對於人民的控制有了某種程度的放寬嗎？

毫無疑問，人們不大害怕，他們可以互相交談。

警察顯得更少熱心去理了。知識份子被處於「謹慎」監視之下。與俄羅斯相反的，這裡沒有反對的報刊或者非官方的工會（雖然這些對他們極端需要），這樣，報紙就不能直接評論現時對於人民公僕的不滿。但是《胡志明市工人報》刊出了不加評論的「讀者來信」。

新技術也方便於對外開放，而沒有被控制的可能。電腦都有自由的電子郵件，個人甚至可以入Rouge（紅色）網，在河內和胡志明市有一種電腦酒吧，顧客常常要排長龍才能進去。最近當局查封了一本使他們不高興而與某些事件有關連的書（1956-7年的《百花》），通過電子郵件，抗議立即傳播開來。

在越南，儘管現政權有拙劣的仿製品，你相信還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復甦的前景嗎？

無疑的，私下裡有一種意見，當然是一種非常少數的意見，首先在35到40歲的知識份子當中，在作家、藝術家、電影製作者，同海外有聯繫的、從1997年以來一種意識的轉變：有一種渴望了解和一個解放了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幫助這裡的一些人，我們對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譯《被背叛的革命》、《文學與革命》、《我的生平》在這個國家裡已經被很好地接受，而我們繼續去翻譯。兩年前，我已經告訴過你，在河內，我在一家書店裡找到了丹尼爾·班賽德著的「Marx l' intempestif」翻譯成越南文版，我是多麼地感到驚奇。這不是容易讀的一本書，然而第一版800冊書一年內就售完了，第二版1000-1200本也賣完了，我們正準備出版第三版！

我們目擊一件似非而是的事：市場經濟需要某種程度的民主來起作用，並且達到某種廣度，允許這種經濟真正的對手表達他們的意見。在七、八年前，那是不可思議的，沒有人能擁有一台傳真機、進入互聯網或者簡單地做複印。可是要建立外國公司，這些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一一每家公司都需要電子郵件。

我不是說要感謝市場，越南將會知道一種真正的民主成長，但是她必須避免以前的政治束縛。殖民開拓本身並不單只有消極的作用，感謝它，人民像阮安寧、藉秋收、胡志明等才能來到法國，吸收法國革命和鬥爭的經驗，用來解放他們的國家。

當然，75到80歲的男人中，有保守份子，但是他們越來越少地呆在領導的地位了。歷史學家，甚至最著名的，要求重寫越南的歷史，例如《昨天和今天》雜誌出版了研究胡志明家史的研究報告，其中，他的兄弟以一種全新的風采出現。直至現在，他曾經

被描述為反法帝國主義活動、受殖民主義者壓迫的犧牲者。事實上，他是一個酒鬼，曾經捲入放蕩的生活的陰影裡。曾幾何時，真是不可思議！……

社會主義思想的復興來自下層，它仍然是脆弱的，而且大問題在於：能夠做出什麼事情來，從外面幫助它，十年後，經過對它的嚴厲批判之後，領袖們向他們的黨大肆吹捧「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他們翻譯中國的理論著作，論述「具有社會主義方向的市

場經濟」，用社會經濟協會的名義註明：「內部交流」。

我們要使我們的思想，讓那些越南人了解，他們以一種日益增長的批評眼光，而不考慮市場作為社會發展的最後一個名詞，評論他們的過去。這是最重要的。這種轉變當然仍很微小，但它是一種質的轉變：在此之前，沒有過像它這樣的事物。

（楊萍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2月號）

越南稱讚保大勒爾

克禮文

發現現代越南書本稱讚佐治·保大勒爾，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他的故事開始於1991年2月，當讓·捷奎士·蘭克勒爾，一個前法國議會的代表，50-54年的越盟俘虜，指控保大勒爾指揮法國戰俘營，並且他的手沾滿血腥。

鬧得滿城風雨的保大勒爾的案件，開始和繼續好多年了，指控保大勒爾侵犯了人權一案，最後由法國法庭裁定沒有事實根據。

這個案件可能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他會從越南當局和他以前的同志那裡接受有力的支持。但相反的，卻是悄然無聲，為什麼？

回顧1967年的法國，隨著大赦法的引用，保大勒爾以一種批判的眼光向越南共產黨的所為瞧了瞧，

現在在巴黎Jussieu一所大學當講師，他寫了一系列批評越南官方封住知識份子嘴巴的做法。越南當局沒有饒過他。

當然，如果對保大勒爾的指控是無辜的，在恢復名譽的開始也需要有一些批評。他接受了，這與他同時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他用毛澤東思想參加了對戰犯的再教育，他後來將會批判的，但是Huu Ngoc（友玉，譯音）對此似乎仍然是贊成的（他內心深處仍然贊許他們嗎？）

佐治·保大勒爾通常住在療養院，即使他不能馬上接納邀請返回河內，他知道他的越南朋友沒有忘記他，他已經得到安慰了。

保大勒爾——一位知名的越南學者

胡悟

這件事發生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在越北Viet Bae軍事地帶的心臟，建立了敵軍內部政治工作指揮部。在1951到52年間，當我在叢林中隱藏在大竹樹叢的棚屋，快步走過時，遇上一個24、25歲的年青法國人。他體格魁偉，腴腆，身穿短裝，頭帶

童子軍帽，面容憔悴，眼神沉思，說話滔滔不絕地，想要全部知道和了解關於越南人民的抵抗。他曾作過6個月牛車旅行，沿著後來的胡志明腳跡，走過了約2千公里路。他就是佐治·保大勒爾，一個哲學教授，他剛捨棄了在佔領區的一所法語高等學校，投誠到越

南人民這邊來。在我們的第一次相遇之後，作為歐洲人和非洲人戰俘再教育局的幹部職位，我經常遇見他。一年多之後，保大勒爾就成為113營戰俘的首席代表，跟隨著年卡夫（Niean Biean Phuu譯音），去到河內，同一個越南女子結婚，並做《越南之聲廣播電台法文簡報》的副主編，同時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

在60年代早期，他帶著沉重的心情回到法國，在那裡，取消了他以高級叛逆罪被宣判死刑的判決。他在巴黎第七大學教了20餘年的越南歷史，直至90年代開始，這時候他安靜的生活被晴天霹靂似的事件破壞了。JJ·比奧克萊爾，一個前越南戰俘，前戰鬥員和前法國部長，事前沒有警告，就向政府控告保大勒爾，指控他侵犯了人權。比奧克萊爾稱呼這個教授為「屠夫」，並指控他在越盟113戰俘營致使大量戰俘死亡。

審判持續了許多年，並被當做一件小型的德雷福斯事件〔註〕受關注。如果提供給右翼政客，仍然是對殖民主義的留戀，和給「保守黨」一個好機會，高揚侵略主義的愛國精神。儘管由他的同事、朋友和知名的知識份子建立的保衛保大勒爾委員會的反擊，這個指控遭受到強烈的和一致的批判戰役，他們仍然侵犯他的私生活，威脅要謀殺他，並千方百計破壞他的名譽，他們甚至忘記給他發薪俸，但正義終於勝利。他完全勝利地從法庭走出來，免除了這個捏造的指控。他的肉體給摧殘了，精神上也快垮掉了。

不，他沒有因為抗議殖民主義的征服而背叛他的祖國，他沒有因為探求啟發戰俘在越南戰爭中的性質而侵犯人權；反而對於法國的民主傳統，他做了不少增光的事情；他不要他的國家在越南重複納粹份子在法國國土上犯下的罪惡。

只有通過費力的調查之後，皮埃爾·托馬斯上校才能恢復對保大勒爾的保衛，在越南戰俘營中高度的死亡率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惡劣的熱帶氣候，缺醫少藥，食物不足（這是由於法國的環境本身而引起），和戰俘的士氣低落。沒有鞭笞，沒有拷問，沒有任何種類的虐待。至於精神上的折磨和「洗腦」也沒有過。不過，甚至一本重要的著作，就像《哲學詞典》（Larousse-1975）都是重複這本書的詞目的。這件事說明「在印度支那戰爭中越盟軍隊使用了心理條件的方法。」這種政治的和心理學的著作在戰俘營中運用，試圖使政治犯了解印度支那戰爭的非正義性和我們抵抗的合法性。他們被簡單地提問，要求和平和遣返回國，不把他們的武器轉過來對抗法國軍隊。

沒有肉體的或精神的強迫。根據沙衛爾·德·維蘭尼奧夫（Xavier. de Villeneuve）的證言，在1952年7月14日接見法國《世界報》記者時說：我自己簽署了許多宣言（要求結束越南的戰爭）同我的同志們一起，我們沒有受到壓力。

現在讓我們撇開這個太天真而沒取得成功的政治新手保大勒爾，而談談這個越南的學者保大勒爾——一個忠誠而不知疲勞的人。他對於越南的愛，使他選擇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作為他研究的對象，和終生的工作。「在我們的生活中，這個國家曾經支撐和仍然支撐著我們全體，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對於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她是土生土長的國家，斯土斯民的懷舊之情，將永遠不會褪色；對於另一些人，她是非常遙遠而又非常親近的國家，我們祝願她再次成為明天的希望。」這是從一代人中被越南強烈感染，在心坎中烙下記印，包括保大勒爾在內的集體忠誠的表白。卡笛兒尋根問底，佐治卻不要一種盲目的愛。對於錯誤的東西他毫不猶豫地提出批評的意見。

在從事研究越南之前，他認真地做好準備：在他旅居越南期間，他過著平民的生活，學習語言，翻譯當代的小說和追隨河內大學的文史課程，在越南Romain ville他的家裡，他建立一個豐富的圖書館，包括獨一無二的收集印度支那的名信片。他的主要著作有：《古代越南的私有財產和集體財產》、《越南的傳統和革命》（合作）、《Phon Bodi Chaau的回憶》；《Phan Bodi Chaau和這個時期的越南社會》，《Ciaup，胡志明》；《在越南農村狂熱崇拜的中心權力集錦》、《流散在外的越南人》（自傳）和翻譯Ngoa Taat Toa, Nguyeon Coang Hoan和Vuo Troing Phuing的小說。佐治的最後的未付印的手稿：《越南的禁忌文化》，《越法詞典》（未完成）仍然在我們的手中。我們希望他盡快來到河內，以便他的越南朋友能夠給他一些安慰，他非常需要它，因為他現在病得很重，已經在醫院呆了兩年了，常常伴隨著一種感染和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因為不公正和無法解釋的攻擊，對此，他已然是倒下來犧牲者了。

（楊萍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2月號）

〔註〕德雷福斯（1859-1935）法國軍官，猶太人著名的德雷福斯當事人，因被軍事法庭以叛國罪判終身監禁（1894）而激發要求釋放他的政治風波，經重審予以平反昭雪（1906年）。

安龍公司式的騙局，是資本主義美國的通例

麥克勒

安龍是全美國第七大公司，資產達24億美元，如果可用繳納稅金數作為成功或失敗的尺度，則所有的跡象都說明，安龍在過去近五年中已有四年沒有繳納公司稅了。

但這個零數字，卻對美國主要公司的公共財庫作出了貢獻，這樣的例子在資本主義美國並不是少見的。成千億美元的利潤僅僅是為了少數富人的利益，他們逃避公眾檢查，逃避稅務。

像安龍這樣的龐然大物，它既是能源的經紀人，股票市場的投機家，兼併和拾得的能手，但又是價值產出極小的公司實體，就這些公司來說，逃避稅務在美國商界是通例，決不是例外。

在安龍案件中，它那頗有「創造力」的阿瑟·安達信（Arthur Anterson）會計公司，是美國的五大會計公司之一，在逃稅的世界各國中設有900個分公司，它是專門為統治階級富翁們服務的，把交納給山姆大叔的稅金縮減到等於零。

民主黨人試圖利用安龍醜聞來攻擊布殊政府及其內閣高層官員，因為他們都從安龍慷慨賞賜者身上得益非淺，但是請民主黨人再想一想，如果安達信會計公司的會計手法和調整動作，不僅發生在布殊政府任內，而且也發生在克林頓政府任內，那他們又將如何呢？

美國國會本身是安龍公司的同謀犯，這已是公開的秘密。由參、眾兩院批准的最近一次能源報單，包含有200多條款，都是直接有利於安龍公司的。這個慷慨解囊的龐然大物是採用賄賂方法去打通的，即用大筆選舉捐款贈給71名美國參議員以及大多數眾議員。

當喬治·布殊總統以安龍公司主要受益人出現時（他獲得60萬美元以上的捐款），而他的另一些朋友也得到相同的數目。克林頓夫人希拉里，參加一些人主辦的列隊遊行，這些人便突然決定把安龍公司的錢轉到了私人慈善機關去了。

當安龍公司得到了風聲，說證券交易委員會（以

下簡稱S.E.C.）要審查賬目時，他們便發話了，要毀掉證據。當時安達信會計公司的主要合伙人D.B.鄧肯（D.B.Duncan）是負責安龍會計的，也是他策劃毀掉證據。當鄧肯成為替罪羔羊並被開除公職時，誰也沒有認真去考慮一下安達信的高級負責人，更不必說安龍公司的主管們，是否對鄧肯的行為是一無所知的。

國會聽證會正在匆匆忙忙地進行中，那批同謀的參、眾兩院議員彷彿也要進行徹底調查。參議院內的政府事務委員會行動起來要進行「整頓」，這個委員會還要召集第一見證人，前S.E.C.主席阿瑟·萊維特（A.Levit）到會作證，這位萊維特先生三年前曾設法嚴格執行審計標準，卻被國會中安龍的友人們挫敗了。

大國公司誇大利潤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安龍公司由同一邏輯、但在不同理由所驅使而開始經營的。S.E.C.要求為一流的股票市場投資者，多少要提供點真實情況，這些投資者要了解公司的季度財務報告，並希望得到真實的基本情況。

與此相反，大國公司力圖在財務報告上要花招，隱瞞問題，並誇大利潤及其發展前景。他們這樣做，部份理由是為了保持及提高他們公司在各不同交易所中公開出售的股票價格。安龍的破產，這在美國是最大公司的破產，已使許多一流投資家震驚不已，因為這暴露了安龍所報告的實際利潤並不存在，如果說這不是一概如此，但在大國公司交易中是很普遍的行為。

安達信公司的「創造性」會計手法可以為安龍服務，當然也有可能為其他的公司客戶服務，但財務界的操縱者、投機家乃至公司首腦卻是心中有數的，這種會計手法是有一個限度的，最終，破產了的或正要破產的公司不得不坦白交代真相。

這真相就是每年的利潤率在不斷地、大幅度地下

降，在過去兩年中利潤率的下降才是真正地動搖了美國大公司和美國的股票市場。面對全世界激烈的資本主義式競爭，實際上美國每一個重大行業和世界經濟利潤和利潤率都在直線地下降——正如安龍公司的醜聞所揭示的，實際數字還要糟糕得多。

各種跡象很久以前早已存在，唯獨官方統計員直到去年12月，還不宜佈這種明顯存在的事實，這就是相當時期以來，美國經濟已經出現嚴重衰退了。這個很不光彩的「衰退」一詞，在大國公司的詞匯中是找不到的，因為財務界的預言家們，在他們被迫承認之前，總是祈求上帝賜給經濟復興，他們所害怕看到的是突然間被扔到了慘敗的萬丈深潭中去。

安龍公司經理、董事脫身自救

安龍公司的肥皂泡吹破了，使7,000職工大難臨頭，他們發現自己的退休儲備金和就業機會全被剝奪了。類似的對工人養老基金的掠奪行為，每天都可在全美國的公司發生。

安龍公司的經理、董事們，與布殊政府以及腐敗的資本主義政治總框架是緊密相連的，他們可以脫身自救，而幾十億元的財產原封未動。安龍總經理K.L.萊（K.L.Lay）及其親密的助手處理掉他們的股票而自救，卻不許職工擁有的安龍股票出售。

安龍，這個「新時代」的實體，完全陷入了投機冒險的泥沼中，它持有的實際價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資本與它的商品買賣一樣是流動不定的，在能源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買空賣空，但有數千億美元在它手中轉來轉去。在國外賬戶中洗錢，可能是永遠也不會被發現的。同時還採用會計騙局來加以隱瞞，因此，安龍公司少數貴族的財富是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安龍的經歷已經動搖了政治體制，政客們一個緊接著一個，爭先恐後地要隱瞞他們同這個撈錢的龐然大物的聯繫。但幕後，統治階級的真正權力經紀人，正準備著另一個掩蓋著的騙局。

由於安龍的犯罪行為公開之後，公眾的無比義憤匯成一股浪潮，但這短暫的浪潮似乎又要退卻了，因為一批一時受驚的醜聞參與者，準備要洗清他們的罪行，設法找到適當的替罪羔羊。

勞動人們是最大的受害者

對於勞動人民來說，安龍的教訓是很大的。安龍騙局是通例，而不是個例外。這醜聞再一次證實了，在全美國，大型公司的撈錢事件是沒有界限的。安龍所揭示了的政府與大國公司之間的相互滲透，每天都在重複著。

勞動人民是安龍的貪婪騙局中的最大受害者。7,000名失去工作和養老金的安龍職工，是同被解僱了的千百萬勞動人民共命運，因為有億萬財富的大國公司，以犧牲勞動者為代價，正在加強榨取利潤。

勞動人民在這整個過程中沒有發言權。他們只有挺立起來與共和、民主兩黨割斷聯繫，才能談得上有所收益，因為正是有了這兩個黨，安龍公司及其姐妹掠奪者才會出現。

一個工人階級的黨，富有戰鬥性的工黨，務必在擴大了的、重新振奮起來的工會運動的基礎上，與全國被壓迫者結成同盟，才有希望看到未來的政治機構，能為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去反對那極少數的大國公司。這樣的一個黨在無法避免的工人鬥爭中必將出現。

民主的、戰鬥的工會運動必將要求安龍公司以及所有其他公司公開他們的真正賬目，並要受工會的審查。立即把全美國的安龍式公司，連同整體能源業實行國有化，作為勞工階級的頭等要求。對公司掠奪者的監督權必須牢牢地掌握在勞動人民及群眾組織手中，因為他們從掠奪者的身上是一無所得的。

（蕭明譯自《社會主義行動》3月號）

更正

本刊上一期（總207期）有如下錯漏：

（一）第32頁第1段第5行的「每人每月生活費僅2美元或更少」的「每月」，實應為「每日」；

（二）同頁右邊倒數第12行的「每人收入為13.880美元」，實應為13,880美元；

（三）第43頁沙瑪利的文章漏加：「兆立譯」。

特此向讀者和譯者深致歉意。

《十月評論》編者

巴西大選面臨歷史時刻

馬卡度

巴西2002年大選踏入了一個歷史性時刻，反對黨「工人黨」總統候選人極有可能在這次大選勝出，扭轉巴西政治經濟局面。在最近一次民意調查中，巴西工人黨總統候選人以超過30%領先所有候選人，比起由執政黨組成的聯盟的10%民意遙遙領先。人民倒戈轉向左派反對派的意向，也從工人黨黨內的激進左派「社會主義民主」傾向的總統候選人龐蒂的17.5%得票表現出來。

巴西現任總統卡爾多索是在1994年當選，期間得到連任。他最初的成功，是挾著反通貨膨脹的方案上台。這個經濟方案，是後來稱之為華盛頓共識的路線的一部份，內容包括開放經濟、公營事業私營化、增加投資、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現代化和減少貧窮。

新自由派政策強弩之末

卡爾多索推行這連串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是使國家負債增加，從1994年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0%驟升到2001年的54%。經濟私營化使巴西再度經歷殖民地化，嚴重依賴出口，受到國際不穩定因素影響。過去數年間在墨西哥、亞洲和俄羅斯經歷的經濟動盪，以及阿根廷目前的貶值風潮等危機，已經在巴西發生回響。對比之下，貧困不減反增，而政府醜聞此起彼落，使人民感到不滿。

政府在來臨中的大選儘管民意低落，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起死回生之地。執政黨暫時仍未推出總統候選人，但難保一些有意角逐候選人的政府部長會用批評政府政策來爭取民心，扭轉頹勢。

反對派方面，除了「工人黨」之外，其餘的黨派政綱均與政府的政綱分別不大，所以，要是資產階級決定聯手對付「工人黨」，盧拉也不一定勝券在握。由此而帶出一個問題：「工人黨」應採用什麼戰略，爭取盧拉勝出？「工人黨」的多數和盧拉的選擇是清楚的：儘可能擴大溫和性，及與儘可能多反對派組成聯線。例如，盧拉已經表示，他意欲爭取前僱主聯會領袖、國會議員謝來士作他副手，競選副總統一位。

謝來士這個人物，從來與左派不沾邊。幸好的是，由於執政黨今次落選的機會很高，所以許多資產階級反對派紛紛準備推出自己的候選人，致使盧拉不那麼容易與謝來士組成陣線。

工人黨趨向溫和

盧拉想藉溫和面目來當選殊不容易，他向來給人的印象並不溫和，再者，阿根廷拉盧政府的災難性下台，也表明此路不通。

工人黨最近更改黨內選舉總統候選人及黨大會代表的辦法，將由所有有聯繫成員推選，所以，會在產生了這些人員後，才會召開黨大會，而且大會之前便已經有了全國領導層。這是一次創先河的變化。包括「社會主義民主」等左派都反對這種改變，指出這會大大突出領袖個人，並且使黨選舉強烈受到傳播媒介和公眾影響，使黨領袖和黨政治方向分家。

「社會主義民主」傾向是第四國際的支持者，剛在2001年8月舉行了全國大會。這次大會向「工人黨」呈交了一系列提案，及提出推選龐蒂代表工人黨競選巴西下次大選的總統職位。「社會主義民主」自1999年之後發展迅速，成員增加接近一倍，它的立場一貫是堅持建設「工人黨」，同時批評「工人黨」的政治方向。落實在競選策略上，則是會支持盧拉競選，同時要求他組織左派聯盟。在「社會主義民主」去年舉行的第6屆全國大會，也有邀請第四國際代表出席，反映了兩者關係的重要性。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11月號）



巴西工人黨大會體現出黨內民主

埃斯第默·拉莫斯

1999年11月24日至28日，巴西工人黨927名代表聚集在巴西利亞州的米納斯·澤拉斯的文達·諾瓦訓練學院，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自全國的黨代表，耗資50餘萬美元租用學院裡的社會俱樂部。大量的客人和觀察者不只來自巴西，而且有許多國家（包括法國、葡萄牙、烏拉圭、東帝汶和墨西哥等）的政治黨派、環保運動、人權組織的代表。

大會除了選舉一個新的全國領導機關和黨主席外，議程上預定要討論三個主要問題：

一、根據社會主義的前景，確立新的綱領，對國家提出一個新的計劃；

二、巴西現時的形勢，特別是政治的和經濟的前景，包括黨對卡多索政府的態度、政治聯盟和定於2000年10月舉行的市議會選舉；

三、下個世紀黨的思想的形成。上次爭論包含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反對意見，都隨著新黨章的採納而結束。

向大會提出的12份討論文件，圍繞三個爭論的範圍，以及兩個宣言（一個是特拉波爾荷派提出的，另一個是米爾頓·譚默提出的）。<1>

工人黨主席職位有三個候選人：聯邦代表喬西·迪爾超為現時大多數領導所支持，競逐第三屆連任；聯邦代表米爾頓·譚默；和即將任滿的黨總書記阿爾林多·支那格利亞。

儘管議程上安排有一些項目，討論時被縮減了，有的問題絕少得到充分的辯論。由於考慮到會挫傷大會當中的代表，對於黨和社會主義的觀念幾乎全然沒有得到討論。

大會安排上網站為那些不能出席這次大會的人和新聞記者瀏覽事件、討論和投票選舉等的實況報導網頁。在大會期間共有超過54,000次的上網閱讀。

主要的論文和修正案

大會在第二天著手處理不同論點的文件。

選擇出來的文件，是將要任滿的多數派「鬥爭中團結」的《民主革命綱領》。這份指導思想的討論文

件是用來帶引下一步的討論。在這一次討論中，代表們按主題分組討論這個文件和修正案。三個主題小組建立起來了。他們的討論焦點主要在應不應該在文件中，在保衛社會主義和建設黨的問題上，把「卡多索滾蛋」這個口號包括在內。修正案在小組中至少有20%的人提出，然後才能交到全體大會中去討論。

在大會全體會議上，否決了由諾梭·譚普（Nosso Tempo）文件的支持者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修正案，並建議保持文件原來的形式（提議者提出的修正案重新肯定採納工人黨第七屆全國會議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立場）。

停止償還外國債務的建議被否決。指導路線的措詞被保留下來，為債務的重新談判辯護，附帶下列條件：貸方在政治上的不讓步可能引起停止償還外國公共的債務。而交換國家的進出口資本活動的管制和在匯款利潤稅的水平與國際的水平相一致，那就是30%，而不是現行的水平15%，這是必要的。任何要把外國債務重新收歸國有的嘗試都必須加以阻止。

當前形勢的方針

這份經過採納的文件確定PDT、PSB、PCB、PC和反對卡多索政府的部份PMDB為聯盟者<2>。至於同PPS可能的聯盟，涉及到文件中作出的任何聯盟，都要有條件地按照「綱領性的協議、反對卡多索和新自由主義」<3>的原則。這個文件得到大會的批准，也對其他可能的聯盟打開門戶，直到這些內容得到工人黨地區領導機關的贊同。

大會否決一個限制聯盟的修正案，它認為要全國性地明確表示他們是反對卡多索和新自由主義的黨才能與之聯合，對於「卡多索滾蛋」的爭辯使大會兩極化了。聯邦代表米爾頓·譚默爭辯贊成包括這個口號，指出所有的工人黨的州的會議（只有巴拉那除外）在支持這個口號的基礎上，已經選出了他們的代表到工人黨全國代表大會去。譚默也指出，修正案在這個問題上引起更加廣泛的辯論，「黨的觀念和內部的民主，這些問題對於工人黨是非常重要的。」經過

長時間的辯論，這個修正案建議（包括「卡多索滾蛋」這個口號在內）失敗了。

「卡多索滾蛋，國際貨幣基金會滾蛋」的口號，突出地扮演了最近興起的人民大眾抗議反對巴西政府的角色，尤其是在無地運動的農民當中，和那些曾經在這些動員中起領導作用的其他的社會組織。它也曾被工人黨的活動份子的廣大階層推動過。但是經過一個從政府的代言人的詆毀戰役，和資產階級傳媒譴責那些製造這種號召的人想要繞過民主來廢除憲法之後，工人黨的大多數領導拒絕採納這個口號，聲稱這個口號會損害對黨的民主的信任。

新的領導

由於時間少而受到擠壓，主要地是因為一系列的平行會議妨礙了代表大會的會期而不能及時開會，結束了新黨章的討論，連同以下兩個重要的問題，提交給下一次全國理事會（DN）解決。

一、財政問題將要舉行一次全國性會議討論。

二、在黨章中所有改變的問題（包括財政），至少須有60%的全國理事會成員投票贊成。除了比例代表制之外，都要根據投票選出候選人名單，全國理事會選出主席，在議會的代表團和參議院的兩位黨領袖，工會和青年的部份代表，以及盧拉（Lu La）同志（黨的創建者）和鋼鐵工人工會領袖劉易士·意·施爾瓦，他們是由全體大會直接採納的，正像在以前的全國性會議曾有過的一樣（雖然按照這個程序，在代表中仍有意義深長的不贊同的意見）。

七個候選人名單代表全國理事會（DN）的投票情況如下：

	得票 %	全國理 事會	領導 名額	執行委員 會成員
（中央）諾梭·譚普	90	10	8	2
民主革命派	398	44	35	8
激進民主派	73	8	7	1
社會主義還是野蠻狀態	190	21	17	4
運動工人黨	116	13	10	2
群眾鬥爭工人黨	26	3	2	1
真工人黨源頭	19	2	2	2

計算出來的選票總數912張，包括兩張空白票，兩張廢票。

諾梭·譚普候選人名單是建立於社會主義民主派的基礎上的<4>。民主革命派的候選人是「鬥爭中團結」的多數派領導人，以路依·科爾考為首，他是以前工人黨的主席。激進民主派提出同名傾向的候選人，它的綱領性論點：「建立一個共和政體的民主」<5>。「社會主義還是野蠻狀態」帶來大批的工人黨內左派，包括「左派之聲」、「社會主義力量」和「運動傾向」，以及各種地區團體。運動工人黨是由阿爾林多·支那格利亞、培爾梭·真羅（Tarso Genro）提出的候選人名單和工人黨的許多其他著名人物<6>。「真工人黨源頭」的候選人是特拉波爾荷（Trabalho）派。

在選舉黨的主席中，迪爾超以496票當選連任，米爾頓·譚默以296票居第二，阿爾林多·支那格利亞第三，113票。

註釋：

<1> 特拉波爾荷派思想上與國際的林拔派（即國際主義共產黨）有聯繫。米爾頓·譚默是里約熱內盧的聯邦代表，曾經是黨內所有不同左派所支持的工人黨的總統候選人。

<2> PSB（巴西社會黨），PC do B（巴西共產黨）和PC是較小的左翼黨，這些黨與工人黨一起經常地有一個公共的選舉講壇。PDT是繼承巴西左翼民粹派的傳統的，由喬亞奧·哥拉爾特所領導，他被1964年的軍事政變所推翻。民粹派PDT在許多場合與工人黨達成了選舉的協議，尤其是保證在任何第二輪選舉中互相支持到底，從而在1998年幫助工人黨在南里奧格蘭德州政府選舉中有把握地獲得勝利。PMBD一度是主要的資產階級反對軍事獨裁的黨派，現在是統治聯盟的一部份。但是隨著卡多索政府威望的急劇下降，一些PMDB的人物持著直接批評政府政策的態度，脫離了該黨。

<3> PPS來自老的巴西共產黨歐洲共產主義者一翼，可是，自從清除左翼最後的意識殘餘之後，它長期同卡多索政府合作。

<4> 社會主義民主派是工人黨內傾向第四國際的支持者。

<5> 由工人黨內最著名的一個公眾人物Jose Genoino所領導，他是工人黨在國會中的領袖，一個前毛澤東主義的游擊隊員。

<6> 培爾梭·真羅（Tarso Genro）描述他們的立場為「第三道路」，處於強硬左派與溫和的多數派領導中心之間。

（楊萍摘譯自《勞工旗幟》2000年春季號）

巴西工人黨在南里州的經驗

卡羅斯·亨利魁·阿拉比

工人黨建在巴西最南端的里奧格蘭德州的新型的政府，是對整個工人黨及其黨內每個傾向的決定性考驗。

工人黨在1998年州選舉的勝利，是在巴西這個州的嚴重兩極分化的結果。這種階級對抗在工人黨政府的第一年期間就已經持續進行了。工人黨政府成功地抵抗來自統治階級的壓力，使得學習里奧格蘭德的全部經驗更為重要。

在巴西任何地方推展一個結構性改革的政綱，是最持久和最連貫的嘗試。

參與制定預算案，是這個進程的一個主要成份。這種成功的包含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不僅僅是合法的和加強左派政府的戰略，而且是一種新方法，去創立社會事業性質的行為，建基於直接民主的原素，建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自從奧理維奧·杜特拉州長和副州長米古爾·羅雪托執政以來，已有12個月了，下列的文章評價他們的表現，和顯示出左派政府面對的困難。在選舉期間，這是調集一個廣泛的社會基礎的活動，而實際的統治卻是更為困難的。

對於杜特拉，我們的「全球性的具有建設性的」管理的評價，同巴西其他地方工人黨的行政紀錄的對比是鮮明的。

工人黨在其他州的地方官員，例如在巴西尼亞聯合區，和工人黨的大多數自治行政區（特別是聖保羅州）的，對於現存的社會事業性質的機構已經採取大量的適應，而且他們放棄對抗本地方統治階級利益的嘗試。但是在南里奧格蘭德（下簡稱南里州），不只是有參與制定預算案的制度。像重新協商前政府對福特汽車公司的優惠或者耕作的禁令和修改出售穀物收成的鬥爭，已經確立了同該州的精英們不斷的對抗。

1994年工人黨的綱領性的一致性遭到破裂，直到那時候，黨的文件曾表示渴望促進工人階級和大多數人口的利益，會有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成份。但是這種前景，當它被經濟學家的爭辯沖淡了的

時候，在1989年確立的文件比1994年的更加清晰得多。而在1998年的「最低綱領」，卻完全不存在脫離資本主義制度的因素。然而南里州政府的方針卻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它引起這麼多的明顯批評，因為它在自己的方案裡確定了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戰略對抗。

社會的組織和黨的建設

南里州的經驗曾經維護了另一個連續性——公共機構的政策和社會組織之間的聯繫，這種連續性在工人黨的其他部份已經喪失了。在全國性的水平和在許多其他的州，工人黨已經折散這兩個領域的活動。選舉杜特拉作為里奧格蘭德州長的運動，不僅僅是政治的選舉的鬥爭。它是強大的民眾的動員，工人階級的有組織力量聯同中產階級對抗了資產階級。里奧格蘭德就是工人黨最成功在它的兩臂「鐵鉗」戰略之間展開一個均勢的地方——公共機構結合群眾的鬥爭，去攻擊資產階級的權力中心。

工人黨在里奧格蘭德用非常民主的態度繼續起作用，這是工人黨介紹黨的領導層內有比例地表現黨內不同派別的第一個州。工人黨在南里州的各種會議仍然強調戰士們一起討論決定黨政策的重要性——儘管全國範圍的改良削弱這種工作方法。

換句話說，在南里州的建設是全巴西最先進的經驗，雖然上述的因素不僅僅是工人黨在那裡引起注意的成功的原因，它們肯定是決定性的，對黨的其他人是一個主要的教訓。

那些不喜歡這點的人，時常爭辯說，南里州具有那麼多的歷史的和文化的特點，那就是實際上的「另一個國度」。更多時都是，這種爭論證明是減弱工人黨的政策。事實上，既然南里州不是另一個國家，它就會愈來愈受民族因素的影響，不只是經濟的危機或者是改變聯合州的性質，而且是工人黨在這個國家其他地方的衰退。

就這樣，雖然南里州理所當然有許多文化的特徵，它愈來愈多地捲入民族的政治爭論。而十分明確

的是，參與民主的思想在巴西擴散開來，這種情況是11年多前工人黨勝利地控制里奧格蘭德首府阿雷格里港開始的。現在工人黨控制了整個州，「擴散這個詞」就有多得多的潛力了。事實上，與其把影響該國的其他地方視為他們本地活動的重要工作，他們不如優先發展該州更為有效。

但是另有更多令人憂慮的發展。僅只工人黨的一個少數派，民主社會主義傾向，就分享到我們執政的第一年「全世界肯定的」評價。在首府阿雷格爾港工人黨的多數派最近通過一個決議：指責杜特拉政府在它與福特汽車公司的談判中與右翼的黨派拉關係。這個決議得到「左派之聲」的支持。這個派別是州政府裡最強大的。但是因為某些理由，它並不為政府辯護，而一般地迴避嚴肅地討論問題。這一派同黨的右翼形成了一個集團，即所謂「寬廣的工人黨」，由「鬥爭中團結之聲」派的領袖盧拉（Lula de Silva）和「激進民主派」組成。這些派別提出獨立的文件，批評杜特拉政府為極左的和好鬥的。

這些派別搞不清楚杜特拉政府就是全黨政府。他們被短期的選舉（包括黨內的選舉在內）的利益所迷住。他們誇大了領導的責任，而且他們不能解釋：為什麼他們的行動和言論，在政府內是一種說法，而在黨的集會上卻是另一套。

這些都顯示出在里奧格蘭德工人黨內部為爭取領導權之間日增長的不同，和每個派別的意願，為了負責制訂方案、辯論和貫徹首創精神，應付南里州統治的實際困難。現時是在黨內部建立新領導和新動力，以反映出杜特拉和羅雪托當選以來激發的新形勢和新動力的時候了。

對於南里州發生的事情，工人黨的反應將是就要來臨的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決定性因素。

在南里州，處理這個情勢亦將決定於工人黨內部每個派別的演變，尤其是那些至少直到現在考慮它們自己要成為左派一部份的派別。在最困難的時刻來回應主要的社會和政治鬥爭的挑戰的能力，和鍛煉真正的領導能力，是對這個黨及其每一個派別的性質的考驗和證明。

（楊萍譯自《工人旗幟》2000年春季號）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463428

中國革命問題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元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雙山著	15元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著	4元
印支問題	雙山著	3元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伊文思著	3元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	托洛茨基著	4元
中國革命底總結與前瞻	托洛茨基著	6元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	托洛茨基著	10元
托洛茨基致中國托派的信	托洛茨基著	4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	曼德爾著	8元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諸問題	曼德爾著	30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文集	托洛茨基著	40元
斯大林評傳	托洛茨基著	30元
托洛茨基自傳	托洛茨基著	25元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著	40元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著	9元
論蘇聯的國家性質	托洛茨基著	22元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托洛茨基著	5元
文學與革命	托洛茨基著	25元
十月教訓	托洛茨基著	10元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托洛茨基著	5元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著	3元
熱月反動	托洛茨基著	3元
新路向	托洛茨基著	5元
流亡日記三種	托洛茨基著	5元
戰爭與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著	5元

《出生在戰敗之年》評介

瀧山五郎

去年底，內田雅敏律師出版了《出生在戰敗之年：反戰世代的人生》，記錄著自己的人生與不少相關的律師活動。

其中最有趣的是內田進入早稻田大學後參加的學生運動。內田在運動中始終反對左翼派別之間的內鬥。

1967年佐藤榮作首相即將訪問南越為獨裁政權提供援助的前夜，反戰學生、市民們都在準備第二天的阻止行動。但學生運動中最有戰鬥力的全學聯內部三派：中核派、社青同解放派與「結合」發生對立衝突。中核派拷打早稻田解放派的幹部，解放派與「結合」在茶水大學匯集準備攻擊，中核派在法政大學用棍棒、鋼鐸武裝待命，雙方各有300名學生在法政大學對峙。內田拚命在兩方之間奔走周旋，說服大家把力量用於第二天的羽田機場阻止佐藤起飛的鬥爭。結果，解放派與「結合」的學生在法政大學抗議遊行一周後收兵，避免了反戰運動內部的一場流血衝突。

第二天，10月8日，羽田鬥爭成為60年安保鬥爭以來最嚴峻的反戰運動。3千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與兩千名警察在機場入口處的3個橋頭展開搏鬥，造成一名學生死亡、6百多名警察、學生負傷，58名學生被逮捕。羽田鬥爭進一步引發全國的反戰、抗議活動，與日本政府主導的「收入倍增計劃」、「全民中流意識」形成對照。可惜激進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派」與中核派、解放派之間的內鬥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雙方的死者超過百名。內田很清楚地看到，由於這些內鬥，使日本民眾遠離了左翼反戰運動，遠離了政治。

內田選擇了法庭作為戰場，為民眾、為政治正義服務，這其中最重要的律師辯護案件，是「東亞反日武裝戰線」（1974-75年）的裁判。

武裝戰線最初計劃在橋頭設置炸藥爆破從那須回東京的天皇列車。失敗以後把炸彈投到三菱重工公司，炸死8人、炸傷多人。書評者本人那時聽到這個消息，認為爆炸三菱重工不應該，爆炸天皇列車倒可

以理解。現在看來，對比「9.11」事件的惡劣影響，如果武裝戰線真的成功了，那日本的左翼、反戰運動將受到不可想像的打擊。

內田對於武裝戰線的鬥爭方式當然持批判態度，但他更注重於為什麼這些日本青年會選擇這樣的行動。東京法庭缺席審判因為人質事件被日本政府超出法規釋放到國外的浴田由紀子被告，要傳訊關押在東京拘留所的武裝戰線成員大道寺將司。但東京法庭因為大道寺已被判死刑，不允許大道寺公開出面，內田只得在東京拘留所內與大道寺對面。那是一個珍貴的歷史記錄，兩位同世代的反戰份子，選擇了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生。如果選擇律師人生的話，就應該像內田那樣，為正義、和平與人權辯護！

此書中還介紹「華僑青年鬥爭委員會」，說它最先在左翼運動中提示出日本人對亞洲民眾缺乏作為加害者的意識。在日本人中，當然，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最徹底地意識到自己的罪過並付諸行動「贖罪」。其實，在它們之前，從1965年以來，就有一個叫「日本鬼工」（意譯自朝鮮語）的組織，清楚地意識到日本與朝鮮、中國等亞洲民族的壓迫、被壓迫關係，參與了援救反戰韓國人金東希等的活動。當時本人也有參與其中，共同參加了東京反戰、全共鬥、東京入管局鬥爭、1970年蘆溝橋事件紀念集會等。

內田也擔任1978年三里塚阻止新機場開放的第8號通道被告團的辯護案件。在30多名被告中，主要是第四國際日本支部與「無產階級青年同盟」的成員，他們在那次阻止機場開放的決戰中，貢獻很大、付出的犧牲也不少。

內田自己很幸慶生活在這個時代裡，以自己的職業為這個時代作見證與記錄。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傳記，值得一讀。

（趙京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2年2月18日第1719號）

池田五律著《海外派兵！》介紹

長澤克巳

著者池田五律是「派兵監視編輯會」成員，以一個市民、勞動者的立場從事監視自衛隊的活動。此書《海外派兵！自衛隊的變質與危險走向》由創史社去年出版，售價1600日元，是目前反對修改和平憲法、反對各種戰爭法案的最佳參考書。

去年日本國會強行通過限定對象、時期的「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日本政府從12月開始派遣海上自衛隊到印度洋、阿拉伯海對美軍艦供給四分之一的燃料，同時也運輸修理部件。日本政府聲稱這是在「非戰鬥海域」進行的軍事作戰，但實際上是參加了戰爭。

日本政府更進一步把「時限立法」的限制取消，在「集團自衛權」（此指參與同盟國發動的戰爭）的背景下將於3月份向國會提出戰爭關連法案，著重制定：（1）武力攻擊事態對外法案，（2）物資佔用程序（特別是沒收、凍結、佔用在日朝鮮人的財產、資金），（3）保障自衛隊、美軍行動的順利展開等規定。

與此相配合的就是強行把憲法禁止的自衛隊變質為能夠實際從事戰爭的武裝力量。從日本國防相關支出看，年間已經超出5萬億日元，僅次於美國與俄羅斯，高於中國。從裝備上看，「新中期防衛計劃」（2001年至2005）要增加47架F-2戰鬥機，120輛輕型裝甲機動車，4架空中加油機，P3C偵察機的換代，AH64D新型戰鬥直升機，兩艘神盾艦，以及別的昂貴裝備。總之，冷戰結束以來，日本的軍事開支不斷增強。

本來，蘇聯解體後，數十萬人規模的日本本土進攻已經完全沒有想象的餘地。日本政府以及軍工產業為了製造出自衛隊的存在意義，把「週周事態」（主要針對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災害出動、海外日本人援救等列入自衛隊的主要任務，並趁機把自衛隊轉換成能夠與美軍共同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的軍隊。前年東京都在石原知事主導下的「大型援救」防災訓練，以自衛隊為中心在市區展

開，一方面是預演自衛隊將來在外國都市的市街戰、和平維持活動、援救日本僑民，同時也對日本的住民、團體預演戰時管制方式，把日本整個國家投入到戰爭動員狀態下。

自從1997年的新防務指南以來，日本已經通過了一系列戰爭相關法案，日本已經實際投入了與自衛毫不相關的全球性戰爭，自衛隊已經開始變質為可從事進攻型戰爭的國家武裝力量。日本的軍國主義走向，已經成為亞洲和平的現實威脅。

（趙京編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2年3月11日第1722號）

下列書籍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鄭超麟回憶錄	鄭超麟著	20元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著	2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3卷集	多伊徹著	100元
從蘇聯歸來	紀德著	12元
史事與回憶（3卷集）	鄭超麟著	20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元
香港的前途與社會主義運動	新苗	10元
論基本法與政制改革	新苗	10元
香港人的出路：爭取民主收回主權	新苗	10元
八九民運的回顧與前瞻	新苗	10元
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	向青、劉宇凡著	70元
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	向青著	40元
台灣人民怎樣選擇	新苗	20元
新婦女論	柯俞泰著	54元
苦口詩詞草	謝山著	30元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五)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三章

托洛茨基的

反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鬥爭

六

1934年之後，當斯大林的罪惡真正成為駭人聽聞的時候，托洛茨基的反對斯大林主義、反對官僚專政的鬥爭加強了。基洛夫在該年之被謀殺，在蘇維埃社會中，激發了那個被稱為葉佐夫喪心病狂的恐怖行動，這個名詞來自秘密警察頭子尼古萊·葉佐夫，此人也成為該次恐怖行動的受害人，其職位被同樣醜惡的貝利亞所接替。

這次大清洗的原因，不但在於斯大林的貪求權力及對所有真正或潛在的敵手的病理上的妒忌。他性格上的這些特徵，在1932/33年，當一個要將托洛茨基從流放地召回的提議意外地在政治局中提出的時候、當基洛夫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選舉中央委員會時得到的票數比他多的時候，已經非常明顯了。適當的解釋不得不要把這些事實放在當時蘇聯具體社會情況之中。

當時蘇聯的社會越來越不安寧了。這些大規模的不安寧，首先發生在被強迫集體化、大規模流放的農民們之間，而且也發生在消費水平被急劇減少的城市工人們之間。恐怖與恐懼雖沒有激起公開抵抗，但是不滿的情緒是明顯的。通過他在秘密警察中的廣大通報人網絡，斯大林當然知道人民的這種情緒。黨內的不安也在日益增加，批評的聲音，雖然極為小心，也出現了。由於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蘇聯的國際地位也變得更壞，這也增加了這種不安。

斯大林知道，任何與法國或德國帝國主義達成某

種協議的嘗試，都會在黨內遭到抵制。憑著他的慣常的實用主義，斯大林得出這樣的結論：不管這個黨是怎樣的官僚化，他都不能夠使它、更不能夠使從1930年以前的時期留下來的共產黨核心份子接受他的犬儒主義的現實政治。為了一勞永逸地鞏固他的權力，他不得不要摧毀這個黨。用一條血河把這個黨與古典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分開。在政治上，斯大林的這個決定相應於蘇維埃官僚層之作為一個凌駕於工農群眾之上的、鞏固了的社會階層的特殊利益。

斯大林所發動的恐怖行動是近代、現代歷史上最令人厭惡的罪惡之一。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共產黨員失去了他們的生命。超過一百萬名的共產黨員，其中包括幾乎全部的列寧的中央委員會和1924年至1933年之間的大部份黨國領導人，變成這個謀殺機器的受害者。受害者們被誹謗、控告為人民的敵人、恐怖主義者、外國帝國主義的特務和資本主義復辟的支持者。他們在最可怕的嚴刑之下被迫作出供認。這個完善了謀殺、欺騙機器，其規模簡直無法想像，卻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在蘇聯境內，人民被恐懼、憤怒所癱瘓。在國際工人運動和自由資產階級圈子之中，一部份由於機會主義的想法，一部份由於士氣的低落，斯大林被接受為“兩者之間較少罪惡者”。特別是在斯大林——賴伐爾公約簽訂之後，國際資本認為“現實政治家”斯大林比托洛茨基的危險性小些，因為後者仍在提倡世界革命。

幾乎所有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為這個恐怖行動辯護。共產黨領導人，例如陶格里亞蒂、皮厄克，把他們黨的恰好在莫斯科的重要黨員交給行刑人，滿意於企圖挽救少數人。赫伯特·韋赫內爾，當時已經起了疑心，在1938年寫道：

托洛茨基主義正像一個在一個腐爛中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土壤裡的毒物一樣日益增大……而且正被那些要在蘇聯領土上恢復資本主義、併吞

一部份蘇聯領土的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力量利用著。毫無意外的、但是完全符合於托洛茨基主義的腐敗的功能的是，托洛茨基及許多他的共犯者多少年來一直是被人僱用的間諜。〈42〉

在這個時期的共產黨報刊上，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類似的引句。在莫斯科審判時，法國共產黨報刊居然使用“槍斃這些瘋狗！”這種詞句。

國際社會民主黨派的表現最為懦弱。〈43〉奧托·鮑爾——齊朗斯基派宣告托洛茨基及其他受害者們的罪行比他們的劊子手還要大。挪威的“左派社會民主黨”政府試圖禁止托洛茨基揭露莫斯科審判案的謊言。（他不但被拘留、被制止向新聞記者說話，甚至被禁止採取任何法律行動。）“人道主義者”萊昂·布盧姆拒絕譴責斯大林的罪惡，因為他不要冒著與法國共產黨斷絕結盟的危險。許多左翼知識份子，包括法國人權同盟，在斯大林面前降低自己身份，企圖以不幸的“老布爾什維克”的被迫的供認，為莫斯科的擺樣子公審、斯大林的誹謗辯護。在那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社會主義國際的書記弗雷德里克·阿德勒幾乎單槍匹馬地挽救了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的名譽。

莫斯科審判案的問題也在布蘭德勒——塔爾哈伊默團體的記錄上留下一個嚴重的污點。可能是由於長期以來對季諾維也夫的仇恨（與布蘭德勒被指控為應對德國1923年10月的失敗負責有關），他們拒絕譴責第一、第二次審判。只當他們的朋友布哈林在1938年被審判（第三次莫斯科審判）時，他們才改變立場。

格爾哈德·羅森瑟爾回憶起一則少為人知的事實；法國極右派的主要理論家，夏爾斯·莫拉斯，在莫斯科審判案中看到托派是德國所僱用的證據。〈44〉印吉爾把圖哈切夫斯基犯叛國罪的故事當作真事，把它轉告捷克斯拉夫總統貝尼斯。（可是戴高樂就沒有被這事所騙。）在這個惡毒的、導致紅軍失去統帥的陰謀中，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到底誰在操縱誰：格柏烏在操縱納粹秘密警察，抑是後者在操縱格柏烏、斯大林？西方知識份子的令人難以相信的盲目，在英國作家H.G.威爾斯的事例中，最明顯地顯露出來。他在1929年如此地描述斯大林：“我從未遇到一位〔比他〕更直率、公正、誠實的人。沒有人怕他，大家都信任他。”如果沒有什麼立場觀點的知

識份子會寫出這種令人噁心的胡說八道，像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福斯特、弗林和佩里那樣的“忠實的”斯大林主義者（他們真的忠實，或只是憤世嫉俗呢？），在斯大林死時，會稱這個殺人魔王為“地球上最受愛戴、永遠銘記在各地人民心中的人”（《Political Affairs》〔《政治事務》〕，1953年4月號），就不足為奇了。

斯大林的謀殺機器也在蘇聯境外試圖向斯大林路線的批評者、斯大林的整肅的批評者下手。這首先發生在西班牙。POUM〔原文沒有提供全名，譯者的記憶好像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領袖安德雷斯·寧，只在先前的幾個月還與西班牙共產黨的代表們一起參加了西班牙的卡塔盧尼亞地區政府，幾個月後卻確確實實地被拷打致死。〈45〉許多國外革命份子被謀殺了，其中包括托洛茨基的秘書，歐文·沃爾夫。格柏烏的殺手們接著在瑞士、法國襲擊。蘇聯在西歐的秘密警察頭子伊格納茨·賴斯，因莫斯科審判案與斯大林決裂、加入了第四國際，卻在日內瓦被謀殺了。第四國際行政秘書魯多爾夫·克萊門特被肢解的屍首被發現浮在塞納河上，他在被殺前正在籌備第四國際的成立大會。托洛茨基的兒子里昂·西道夫在巴黎的一間俄國診所中，在難以理解的情況下，死去。

托洛茨基和西道夫兩人，幾乎單獨地站出來，反對斯大林的謀殺、誹謗的運動。當托洛茨基被挪威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禁止發表意見，以致不能夠揭露莫斯科審判案的謊言時，西道夫出版了他的《Livre rouge sur le proces de Moscou》〔《關於莫斯科審判案的紅皮書》〕，一書，以事實反駁斯大林主義者的主要指控。〈46〉當時公眾的反應非常少，但是這本書卻可能使那些尚未向斯大林主義投降的左翼圈子，對這個政治迫害的憤恨，有了聲音。這樣子，就為一個暴露斯大林的謊言、挽救被誹謗、被謀殺的俄國革命領袖們的名譽的國際運動，打下了基礎。地區或全國委員會在世界的許多城市中建立起來了。〈47〉這個國際運動的高潮，是美國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在墨西哥主持了一個探究真理的法庭。它於1937年4月17日對托洛茨基和莫斯科審判案中的其他被告們作出了它的判決：沒有罪！〈48〉這在說英語的國家中的反應，並非無足輕重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Stalins Verb rechen》〔《斯大林的罪行》〕一書中總結了他對莫斯科的謊

言和誹謗的反應。他對參加紐約保衛托洛茨基委員會於1937年2月9日所組織的群眾大會的六千聽眾的演說，到今天，仍是對這個擺樣子的審判最好的暴露與解釋。〈49〉

七

托洛斯基對斯大林的罪行的鬥爭，並不是基於個人仇恨。對托洛斯基至關重要的，是俄國革命和列寧的名譽。邏輯地說來，這樣一個對“老布爾什維克”的正面攻擊，意含著對革命、布爾什維克黨和列寧的判斷。〈50〉對托洛茨基而言、一直到他生命的終結、也至關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保衛他的蘇維埃祖國。這裡所說的祖國，是照這個字的社會及民族的意義而言的。

托洛茨基深信，斯大林的罪行，比他自己從1923年以來的任何反對活動，更會減弱蘇聯和蘇維埃社會。當整肅擴大到紅軍中的時候，當圖哈卻夫斯基將軍被處死之後紅軍中的三分之二的共產黨員也被斯大林處死的時候，托洛茨基確實具有“祖國在危險中！”的想法。“祖國在危險中！”這句話，是他的出名的、導致紅軍的組成的1918年呼籲書的標題。正如日後的事件所證明的，托洛茨基的恐懼是有充分根據的。紅軍領導層的癱瘓，是造成它在1941年被打敗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失敗把蘇聯推到了崩潰的邊緣。〈51〉

如果，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看看反對派、主要是左派反對派與斯大林派的“核心份子”（它的極大多數人日後也成為這個恐怖行動的受害者）之間的衝突，如果我們把這個恐怖行動的巨大規模考慮在內（我們重覆一次：一百萬共產黨黨員被殺害），那末這個恐怖行動的性質很像內戰，就沒有什麼疑問了。〈52〉

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支持者不把內戰解釋為個人之間的矛盾，而把它解釋為社會階級、或者社會階級主要部份之間的衝突。在這個意義上，蘇聯的血腥的大整肅，是該國的政治反革命的類似內戰的最終階段。托洛茨基反對這個反革命的鬥爭，就其歷史意義而言，表達了蘇聯無產階級與蘇維埃官僚之間的社會——政治性的衝突。斯大林若要在這場血腥內戰中取得勝利，有權力行使政權是絕對必要的。對葉佐夫喪心病狂的這種估量，也使我們對蘇維埃熱月反動何

時開始這個問題有了一個結論。這個問題在托洛茨基心中迴蕩了十五年以上，他曾改變意見好幾次。

蘇維埃熱月反動何時開始？答案是1923年。1990年在德國伍珀塔爾城〔恩格斯故鄉〕所舉行的托洛茨基論壇會上，佩切科爾金教授，因為可以看到蘇聯的秘密檔案，就說在1923年地區的高級幹部的生活水平比技術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九倍，而中央的高級幹部則高三十倍。〈53〉

對蘇維埃官僚層及它的政治代理人斯大林而言，托洛茨基反對莫斯科審判案的運動，是這位紅軍締造者是他們最重要的政治敵人的最後證據。在他們的眼中，這個衝突沒有辦法從政治上解決。它只能夠用肉體上消滅托洛茨基來解決。這個要謀殺托洛茨基的決定，好幾年前已經作出了，現在的急迫性更大了。〈54〉謀殺機器在北美洲建立起來了，因為從那裡比較容易達到墨西哥。1940年8月20日，它終於成功了。〈55〉

正與許多其他案例一樣，蘇維埃官僚層也錯誤地相信行政壓迫的萬能。出於每個人的意料之外，包括托洛茨基的最大的敵人和最好的朋友，他的葬禮卻成為一次激動人心的示威遊行，表露出墨西哥人民對這位被謀殺的革命家的自發的同情。數以萬計的人們哀悼他，參加他的出殯行列。它是將要來臨的事情的一個跡象。他的思想和他之作為革命象徵的角色永遠是活生生的。在今後的年月中，他的思想將會散佈，雖然一時不會達到他所預想的程度。

到了今天，由於Glasnost〔開放〕，蘇聯發生了下一個決定性的轉變。托洛茨基為1937年紐約集會所寫的演說包含了以下的話語：

對於所有那些認為社會主義不是空話、而是有真正的道德生活內容的人們——前進！威脅、迫害、暴力，都不能阻止我們。我們也許會被打敗，但是真理將會取得勝利。我們將會為它清除前進的障礙。它將會打贏。〈56〉

在今天這個時刻，真理的確在蘇聯取得勝利。莫斯科審判案的被告者已被蘇聯法庭的一個決定正式平反。擺樣子審判案的判決已被判決為毫無根據、毫不真實。斯大林的整個謊言網絡已被正式揭露。至於托洛茨基本人，當《消息報》在他被謀殺的五十週年的前夜寫道，托洛茨基已經是“一位偉大、誠實的革命家，其作為〔在他1917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以後的

人——此句由作者所加〕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僅次於列寧”，他在政治上是平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為真理、特別是為關於歷史的真理所作的鬥爭，現在被看成為爭取民主化、反對這個制度的深刻危機、爭取適當的政治解決方法的鬥爭的決定性因素。

托洛茨基在1937年寫道：

人類對於應用嚴苛措施為偉大歷史目標服務的記憶是寬宏大量的。但是歷史決不饒恕一滴血，如果這滴血是為了奉獻給實施專橫統治、享受特權的新摩洛神而流的話。道德的感覺，會從永遠相信歷史懲罰將與罪惡的大小相應之中得到最大的滿足。革命將會開放所有的秘密檔案，評論所有的審判案，平反被誹謗者，建立被任意殺害者的紀念碑，使劊子手們的名字遺臭萬年。

<57>

在今天這個時刻，所有這些預言都已實現。沒有一件事比以下的事實更能顯出托洛茨基在人格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偉大了：他預料，斯大林的殺手們將會向他下毒手，可是他在死亡前面，仍然對整個人類將會有更美好的前途充滿了信心。

第三章註釋：

<40>關於這幾次整肅的深度與廣度，見Medvedev的《讓歷史來判斷》。

<41>可是，蘇聯人民對這個恐怖行動所顯示的態度，是間接地用人道的、有時是動人的態度對待、照顧受害人的子女，如果這些孩子們沒有被殺死或關禁的話。

<42>關於德國共產黨人和反法西斯主義者在蘇聯的命運，見 Hermann Weber的《Weisse Flecken in der Geschichte》〔《歷史上的空白點》〕，（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89年。

<43>在他們中間，有英國的費邊社、Sidney和Beatrice Webb、英國律師Pritt、德國作家Leon Feuchtwanger、羅曼·羅蘭、Henry Barbusse和Andre' Malraux等重要法國知識份子。包括ILP〔獨立工黨〕及（Willy Brandt的）德國SAP〔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內的左派社會主義者的倫敦局，則拒絕參加這個調查莫斯科審判案委員會。

<44>Andre' Gide〔紀德〕、Andr'e Braton和Ignacio Silone等作家是幾個值得令人尊敬的例外人物。

<45>後來就有對POUM的幾位領導人的審判，他們都被判處長期的徒刑。可是罪名卻不是“反革命”或“與法

西斯主義者合作”等等，而是準備實行無產階級專政。POUM審判案的文件已被Victor Alba和Marisa Arderol所出版：《El Proceso del P.O.U.M》〔《POUM的審判》〕，巴塞羅那1989年。

<46>西道夫的《紅皮書》最近已在德國出版（ISP、Verlag，（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當時挪威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的警察部門威脅托洛茨基的兩位秘書范·海耶諾特和Jan Frankel說，如果他們不馬上停止援助托洛茨基、離開挪威的話，就把他們抓起來交給納粹。

<47>我在這裡要講一點我個人的故事。我是受了安特衛普的保衛托洛茨基委員會和西班牙內戰的影響而開始同情托洛茨基主義的，當時我十三歲。

<48>《里昂·托洛茨基的案件》，《對莫斯科審判案中對他的指控的聽證結果的報告》，紐約1968年。

<49>《Stalins Verbrechen》〔《斯大林的罪行》〕是1937年在蘇黎世首次出版。他對紐約集會的演說收集在《托洛茨基演講集》，紐約1972年。

<50>人們能把反革命份子領導的革命想成什麼呢？我們應該怎樣估計列寧的政治、組織能力，如果他的黨的大多數領導人是匪徒的話？說他們到後來才變成反革命也不是理由，因為第三次莫斯科審判作出結論說，他們早在1918年已從事犯罪活動。列寧當然不知道這事。要像斯大林那樣的偉大人物才發現它。

<51>圖哈卻夫斯基可能是1930年代歐洲最好的軍事戰略家。他曾預測到德國的攻擊計劃，而且準備了正確的反應。

<52>最近蘇聯公佈的數字指出，在1937-38年期間，恐怖行動的受害者約有四百萬至四百五十萬人，其中幾乎有一百萬人被處決。斯大林所殺害的紅軍高級將領的人數比以後在戰地上死的，高出三倍以上。

<53>引自1990年3月11日的《Frankfurter Rundschau》報。

<54>今天的蘇聯有很多關於暗殺托洛茨基的準備工作的文獻。斯大林應負的責任在Glasnost〔開放〕前很久就被知道。兇手在死後被授以列寧勳章，而且被埋葬在莫斯科的“官方”墓地。最近開放檔案材料建議，斯大林早在1931年就親自下令暗殺托氏，而且要格柏烏的最高級官員組織此事。

<55>見Issac Don Levine的《刺客的心態》，倫敦1959年。

<56>在《托洛茨基演講集》中。

<57>引自《結局的開始》，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6-37年》內，紐約1970年，第382頁。

第四章

托洛茨基的 可供選擇的經濟戰略

對托洛茨基的舊的誹謗已被官方擯棄了。但是現在，新的神話和指控正在黨的圈子中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之間製造出來。〈1〉這些指控中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控說，斯大林在1928年之後所實施的冒險主義經濟政策，換句話說，對農民的強迫集體化、對所謂kulak〔富農〕的集體放逐、極快的工業化速度、經濟的閉關自守和等級的指令經濟等等，事實上都是托洛茨基的觀念。它聲稱，追根究柢，托洛茨基應該對這個政策負責。斯大林只不過把托洛茨基的綱領付之實施，雖然用托洛茨基決不會贊成的野蠻手段。

這個結論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得勝的話，蘇聯在1928年之後的經濟、社會發展不會有什麼大的不同。與這個發展相依的政治制度，在所有主要的方面，也會與斯大林所創立的政治制度相似，雖然可能不會有1934年以後的集體鎮壓和葉佐夫喪心病狂的恐怖行動。

這個神話可以根據1923-40年時期的文件完全加以劃破。現在已經有好幾位蘇聯作家拒絕接受這些指控。例如，列寧格勒的歷史學家比利克就指出，第一個人主張引進新經濟政策、拒絕接受延長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是托洛茨基。拉齊霍夫斯基則承認，托洛茨基在一方面反對新經濟政策時期短期經營私人企業者和富農、另一方面反對官僚的時候，已經以民主的自我管理和市場這兩個密切相關的支柱為基礎，為蘇聯的重組製訂了一個綱領。一度是馬列主義研究所研究員的鮑爾德尤戈夫和科斯洛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一篇研究報告，指出1926-27年的聯合反對派的許多關於經濟政策的文章都非常有相關性。達伊諾夫曾經有力地爭辯說，托洛茨基的經濟政策是與新經濟政策完全一致的。根據達伊諾夫的意見，托洛茨基反對官僚的鬥爭，是一場為了蘇聯的社會關係的民主化的鬥爭。托洛茨基是在保衛一個“文明的布爾什維克模式”。〈2〉

歷史背景

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所建議的經濟政策無疑地在1923-35年時期經歷了許多變化。我們必須區別左派反對派在1923年的建議；1926-27年的聯合反對派的建議；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

《過渡綱領》（1938）中、《保衛馬克思主義》（1939-40年）和他的《斯大林傳》（1940年）中所發揚的可供選擇的戰略。但是所有這些接連的經濟政策建議有一個共同線索；它們都建基在一個共同戰略，這個戰略是與下列歷史前提有關的：

1. 在一個國家建成社會主義、建成無階級的社會是不可能的。只要社會主義革命至少還沒有散佈到世界上主要的工業化國家去，蘇聯的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仍然在軍事上和在世界市場的壓力下受到威脅。

2. 在蘇聯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換句話說，開始工業化、現代化這個國家，逐漸地減少社會衝突、社會不平等，是可能的。

3. 長期的經濟、外交政策，以及長期的建立公共機構，必須首要地以提高工人階級在蘇聯社會中和在世界上的社會重量為目的。這就需要逐漸地改變城市與鄉村之間、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工業與農業之間、工、農業的直接生產者與國家、社會的行政人員之間的關係。它需要快速地減少失業〈3〉，需要逐漸地改造生產關係，朝向增高工作大軍參與企業的管理。必須促進、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因為沒有這一點，整個戰略就會失敗。這就以全面的社會衝突和緊張得到減少、不是加劇為先決條件。這又需要鞏固工人與農民之間的聯盟。鄉村中貧農與富農之間的日益增加的兩極化必須加以減少，而農業供應品之集中在較富農民手上的現象必須改變。

托洛茨基對這些基本歷史前提的唯一的重大的變化是在1932-33年以後，在那個時候，他的基本上是（小資產階級前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力量與無產階級力量之間的）兩極社會衝突的模式被一個三邊衝突的模式所代替。在後一模式中，越來越獨立自主的、正在成長為一個社會階層〔注意：不是階級——譯者註〕的官僚層，被看成為具有更大程度的獨立性和能力，在一段歷史時期中，追求一個既是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又是反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作為一個擴大它的權力和特權的工具。這個新模式也與重新評估市場在過渡時期中的角色有關。

1923年左派反對派的經濟綱領

我在第三章中說過，1923年10月的“四十六人”反對派團體集中它的注意力在政治問題上，特別是黨內事務。然而，這個團體有非常明確的經濟政策。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在他在1924年1月10-11日的莫斯科會議的演講中，著重指出經濟計劃對蘇聯的繼續發展的歷史意義。但是，這是一個一般的歷史趨

向，並不意含對日常經濟政策的任何特別結論：

關於經濟和社會關係的領域，我們以下的進程：我們的國有經濟正在發展，但是我們的資本主義經濟也正在與之平行的發展。……這個路線必須是朝向發展國有經濟、過渡到有組織的積累制度和組成另一個基本的組織形式來與農民集團對抗。……緊接著一段缺乏經濟計劃、農民集團有了相當成功的發展的時期，中央委員會正在作出一個轉變，朝向更大的計劃、社會主義的組織和我們常常說起的社會主義積累的路線。但是，如果這轉變不恰當的話，如果我們的黨對這個轉變點的重要性認識得不夠充分的話……，那末我們將會在行進的道路上遇到許多危險。〈4〉

皮亞塔科夫在第十三次黨大會（1924年1月16-18日）上的演說，提出了托洛茨基已在《真理報》上的“新路線”連載文章〈5〉中所提出的“價格剪刀差”的問題。價格的發展曾經在兩方面呈現負面的趨勢。第一，農業生產的發展比主要地替鄉村生產消費品的工業生產的發展快得多。在農民這方面看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交換比價惡化了。拿同樣份量的農產品去交換，農民們覺得，目前所得工業消費品的份量比過去少了。所以農民們覺得吃虧了。

可是，小生意是由私人貿易商（所謂耐普〔NEP〕人〔即新經濟政策時期經營私人企業者〕所控制。這些小商人在例如像精製的糖等產品的銷售上有半獨佔，因此賣價比國有商店高得很多。因此，城市無產階級的較窮部份大都買不起這些產品。所以工人們也覺得吃虧了。

1923-24年期間，左派反對派對於如何克服價格剪刀差現象提出了具體建議，以防止它危害工、農之間的關係。它認為應該優先增加工業消費品和農具的生產。作為增加工業生產的一個手段，左派反對派建議對人口中較富部份、耐普人和富農徵收累進所得稅。在這同時，反對派建議國家應該放棄貿易順差的目標，那就是，黃金、外幣的積累。目標應該是進出口的平衡和利用一部份累積的儲備金向國外購買機器，以加速工業化的進程。

明顯的是，這些其實是非常溫和的建議。這裡沒有任何“仇視農民”的問題。相反地，這些建議完全符合絕大多數農民的利益。說反對派要用犧牲農民的利益來增加工業品的價格，是不真實的。可是，布哈林譴責這個政策是“取消新經濟政策”、“鼓吹超級工業化”。根據1928年以後的斯大林路線和他“布哈林”自己在1928-29年的建議，布哈林的這個判斷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

左派反對派在1923-24年時期的建議決不是一個

在蘇聯廢除市場機制的企圖。他們所設想的，是利用價格和市場來促進普列奧勃拉仁斯基日後所稱的“原始社會主義積累”。〈6〉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在他的1922年出版的大眾化小冊子《從新經濟政策到社會主義：對俄國和歐洲的將來的透視》中著重指出，市場機制會繼續存在幾十年。但是，他也提倡會減少城、鄉中的社會不平等、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和容許工人們逐漸增加直接參與企業管理的措施。

布哈林和普列奧勃拉仁斯基本來是多年的密友。他們兩人曾經合寫了一本將黨的綱領普及化的書本，名叫《共產主義ABC》。〈8〉他們之間的爭論開始於1924年，關係到新經濟政策所激發的許多矛盾的長期動力。這些矛盾，列寧曾在很多場合中見到的。〈9〉布哈林頑固地拒絕處理超過短期或中期的經濟政策考慮的經濟問題。任何長期的分析會表示，“懷疑俄國革命的內在力量”，等於滑入孟什維克的立場。然而，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勃拉仁斯基考慮長期的問題：那些經濟、社會的進程會培植資本主義的復辟？那些會助長朝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黨的那些經濟政策會促進第一個趨向，那些會促進第二個？

基本上說來，這是社會剩餘產物的形式和分配的問題。必須避免的，是這個社會剩餘產物以私人貨幣資本的形式日益集中在私人手中。這個社會剩餘的越來越大的部份應該流入國家部門。

這個問題與農業長期發展的問題有關。布哈林所意欲的，頂多是一個兩部門的農業經濟；實際存在的，卻是一個佔優勢的私人農業和弱勢的農業合作社。布哈林完全低估了已在蓬勃發展的社會分化的客觀進程。〈10〉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和托洛茨基的設想，是建基在列寧的加速形成農業合作社〈11〉、逐漸地、但是有限度地增加國家農場的數目的方案上。這個方案將會使城鎮（和工人）較少地受到農村私人輸送的上下波動的影響。〈12〉

普列奧勃拉仁斯基的建議中根本沒有什麼強制的意味。合作社和農業的國營部份是依據貧農的自願合作而發展的。他們之加入合作社，並不是主要地通過教育、宣傳的方法，而是從貧農們自己的物質利益出發而達成的。因此，明顯的是，在農業的自願地逐漸合作化之前，必須大量地生產農業的機器和裝備。合作社和國家農場若持有比富農的農場還要高的技術水平，才會為參加它們的農民們保證較高的生活水平。他們才能夠以較低價格賣出而仍得到較高的利潤。這裡沒有強迫運送的問題。普列奧勃拉仁斯基的整個建議是假定貿易中使用價格機制，而且有意識地建基在小、中農的物質利益上。因此才有反對派的1923年

的建議在察里津（後改名斯大林格勒）建立一個大型的拖拉機工廠。

換句話說，從1923年開始，蘇聯有了三個基本上不同的農業政策：

1. 布哈林的政策。這個政策否認在私人生產、私人交換和私人財富（資本）積累的一邊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趨勢的一邊之間存在著具有歷史意義的衝突。在這個衝突中，不是這一邊，就是那一邊，會取得最後勝利。

2. 斯大林派的路線。這條路線到後來承認以上這個衝突而要用與新經濟政策的邏輯決裂的方法來解決它。但它所用的，主要是官僚——行政、恐怖主義的方法，毫不顧及這些方法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後果。長期說來，這條路線證明是沒有效率和非人道的。

3. 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的路線。這條路線瞭解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衝突而要用經濟、政治的方法逐漸地解決它。它要增加大多數人口（主要是工人、貧農和青年，但也包括一些中農和知識份子）的參與來加強公有部門、限制私有部門。這種參與如果不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就不會是可能的。

（未完待續）

第四章註釋：

- <1> 見例如Grigory Vololazov的“L'Essence et les racines du stalinisme”〔《斯大林主義的根源的精華》〕，“Science Sociales, Revue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 d'URSS”，第三期，1990年，第218頁。
- <2> 比利克的文章刊在法國Rouge週刊紀念托洛茨基被謀殺的五十週年特刊中。拉齊霍夫斯基的文章見《莫斯科新聞》（法文版）1990年9月9日。鮑爾德尤戈夫、科斯洛夫的文章刊在《真理報》（德文版）1988年9月30日。
- <3> 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失業率是非常高的，也許高到城市無產階級的百分之十六至十八。見E.H.Carr的《計劃經濟的基礎》，第一卷，第二部份，倫敦1969年，第456頁。
- <4> 《1923年反對派的文件》，倫敦1975年，第47-8頁。
- <5> 《新路線1923年》，倫敦1973年。關於價格剪刀差的問題，見E.H.Carr的“The Interregnum 1923-1924”〔《間歇期1923-1924》〕，倫敦1969年，從第95頁開始。
- <6> 見E·普列奧勃拉仁斯基的《新經濟學》，牛津1965

年（第二章，“原始社會主義積累的法則”）。

- <7> 現版本由New Park〔新公園〕出版社在倫敦1975年出版。
- <8> 現版本由Penguin〔企鵝〕圖書公司在Harmondsworth 1969年出版，卷首有E.H.Carr寫的序言。
- <9>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所講的話，比左派反對派強烈得多。在他所講的許多話中，我們這裡只引出兩段：新經濟政策的意思是以課稅來強徵食物；它意味著回復到相當大程度的資本主義——到多大程度我們不知道。讓外國資本有特許權、將企業租給私人公司當然意味著恢復資本主義，而這就是新經濟政策的主要部份；因為廢除剩餘食糧沒收制度意味著農民們可以將繳稅以後所剩下的農產品自由地出售——而稅只佔那些農產品的小部份。農民構成我們的人口、我們的經濟的極大部份，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必須在這個自由貿易的土壤上生長……
- 從戰略的觀點來看，根本問題是誰先在這個新制度中受益？整個問題是——農民階級要跟誰走？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或是資本家？
- 《列寧全集》第33卷，莫斯科1966年，第64頁。
- 農民的耕作繼續是小商品生產。我們在這裡有一個支持資本主義的、極端廣闊、非常健全、根深蒂固的基礎，一個資本主義賴以持續進行或者再度掀起一次反共產主義的激烈鬥爭的基礎。
- 《列寧全集》，第30卷，第109頁。
- <10> 我要再一次引用列寧的話：
- 什麼是自由交換？它是無限制的貿易，意味著倒回資本主義。自由交換、貿易自由的意思是小業主們之間的商品流通。所有我們至少研究過馬克思主義的要素的人們知道，這個交換和貿易自由必然導致商品生產者分為資本所有人和勞動力擁有人，導致資本家與工資工人的分開，那就是，導致資本主義奴役制的復活。這個資本主義工資奴役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鄉村商品經濟跳到世界上的。
- 《列寧全集》，第32卷，第218頁
- <11> 見《列寧全集》，第33卷，第467-475頁的《論合作社》一文。
- <12> 黨領導層實際上把合作社的問題縮減為消費者合作社。見例如賴可夫對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關於蘇聯經濟的演說。此演說收集在Ulf Wolter的“Die Linke Opposition in der Sowjetunion 1923-1928”〔《蘇聯的左派反對派1923-1928年》〕，第2卷，柏林1975年，第170頁。
- <13> 斯大林公開地說過這點。他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吧！”（1929年12月27日）。

Intensified contradictions and people's resistance in China

Zhang Kai

Premier Zhu Rongji's Government Work Report delivered to the People's Congress this year revealed acute problem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economy. Although economic growth was reported to be over 7.3% for 2001 (and such a figure is disputed by many as exaggera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xpenditure increased by 10.1%, financial deficit reached a new high of RMB 309.8 billion yuan, state bond was 256 billion yuan, and the state defense budget increased by 17.6%. Criticisms were made by delegates and specialists that a huge deficit as stimulant to the economy will bring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future.¹

After a positive note on the economy, Zhu Rongji reluctantly admitted that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in the economy and social life that urgently require resolution. They are mainly: peasants' income growth was slow; in some areas where grain was the main crop and in areas suffering from serious natural calamities, peasant income had reduced; in some places there was serious delay in wage payment;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for some factory production and workers' livelihood; there was more pressure of unemployment; economic structural problems were still unresolved; ecological problems were still quite marked; regional protectionism flourished despite prohibitions; market economic order was wanting rectification; in some sectors or departments, formalism and bureaucratism were serious, extravagance was acute, and some corrupt phenomena were rather marked; in some units, unlawful appropriation of funds and non-abiding of laws were quite general; serious accidents were frequent, and in some places law and order was not good."

While Zhu tried to tune down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s by qualifying them as happening only in "some" areas, there were amendments by the Congress delegates, such as deleting the word "some" from "some corrupt phenomena were rather marked", to highlight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s. As confirmed by Xiao Yang who made the Legal Report, in 2001, a total of 20,120 persons were convicted of corruption or bribery, an increase of 44.35% over the previous year.

On the ques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Zhu Rongji's reply to an American journalist at a press conference was: "the soya beans imported to China from USA is already equivalent to China's total output - 15 million tons. When we wanted to adopt a policy that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implementing, which is to control GM agricultural products, your leaders from USA came to talk to us about soya beans and said this would affect USA's export of 1 billion US dollars, you must be more prudent. But you announce you will impose an added 8-30% tariff on China's exported steel products, which will make it impossible for China to export 350 million US dollars' worth of steel to USA."²

Li Changping, a former township party secretary, wrote about the burden on peasants through listing the expenditures of townships and how peasants are expropriated to bear the burden. He estimated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annual expenditure for townships were: 80 billion yuan of interest for a debt of 600 billion yuan, 80 billion yuan on salary for teachers, 50 billion yuan on books and facilities, 200 billion yuan on salary for a total of 39 million cadres at the county,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300 billion yuan on expenditure of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bureaus at county,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This in all was already 710 billion yuan. Li estimated that peasants had to bear 70-80% of the expenditures below the county levels, which would be about 400 billion yuan, whereas Zhu Rongji's estimate was a mere 50 billion yuan.³

Du Zaixin, the party secretary of Jianli County, Hubei Province, under which was Li Changping's township, said that of the 540 million yuan of debt of townships and villages of that county, the majority was peasants' debt. For example, in Dumu Township, 300 peasant families each had a debt between 12,000 and 15,000 yuan.

The government has not proposed any effective means for tackling these problems. Lu Ming,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aid at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meeting that the state's input into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as very low; it was 6 billion yuan in 1999, a mere 0.4% of the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⁴

Urban employment has been an acute problem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with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Chinese industries will be facing more serious competition. Official figure of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in China was 3.6%, as was reported to the People's Congress by Zeng Peiyan. This means unemployment is at 12 million, including 5 million workers from state-owned factories that have "temporarily stepped down from their position" and 6.8 million of registered unemployed. In addition, there are 40 million labourers (from the rural redundant labour force of 150 million peasants) that move to the cities to look for jobs. *Wen Hui Bao* quoted from specialists that the estimated unemployment rate is well above 10%.⁵ Some other scholars in China (such as Hu Angang) estimate that the actual unemployment rate is around 20%.

In Liaoning Province in the northeast, once a heavy industrial region, large numbers of factories have gone bankrupt. Half of the labour force has gone into unemployment. Official figure last year said that half a million people "stepped down" from their position or had retired or left their job, which amounted to 10% in the whole country. For workers who have "stepped down from their position", which means they still have links with the factories, they are supposed to receive a stipend of one to several hundred yuan a month.⁶ However, delay in payment is prevalent.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Beijing Evening News*, statistics from factories where there are trade unions yield the following figure: in 2000, delayed payment or non-payment of salar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mounted to 36.69

¹ *Sing Tao Daily*, 5 March 2002.

² *Wen Hui Bao*, 16 March 2002.

³ *Sing Tao Daily* 11 March 2002.

⁴ *Wen Hui Bao*, 8 March 2002.

⁵ *Wen Hui Bao*, 5 March 2002.

⁶ *Ming Pao*, 27 March 2002

billion yuan. In the last two years, labour dispute court cases in Beijing have drastically increased. It was 7,480 in 2000, an increase of 42.9% from the previous year. In January to September 2001, the increase was 60%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in 2000.⁷ Xiao Yang said that the figure for closed labour dispute cases for 2001 in the whole country was 100,440, an increase of 33% over the previous year.

Reports on worker protests are numerous. The following are reports of worker actions in March 2002 alone. In Daqing, 70,000 workers from an original workforce of 290,000 workers have “stepped down”; starting from March 11, 50,000 stepped-down workers started a demonstration demanding medical and retirement benefits, and the protest had lasted three weeks. In Liaoning City, from March 11, workers began besieging the government house and sometimes over 30,000 workers from 20 state-owned factories joined the protes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stepped-down miners from Fushun City took to the street in mid March, and among their demands were not only payment of salaries, resumption of the right to work, but also accusations of bureaucrats’ corruption, cheap sale of public property, and embezzlement of funds. Around March 11, several thousand tractor workers in Urumqi in Xinjiang Province also took to the street and protested against sale of state property and land.

In such massive waves of worker actions and protests, a new sign is the formation of workers’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field reports by reporters of Hong Kong’s *Ming Pao*, independent workers’ organizations are in formation. Daqing workers formed “Ad hoc trade

union committee of transferred staff of Daqing Oil Management Bureau”, and elected worker representatives. In Liaoyang, an ad hoc organization of “All bankrupt and unemployed workers of Liaoning Steelworks” was formed, and Yao Fuxin and other worker representatives were elected to negotiate with the government. In the name of their organization, the workers issued open letters, and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from different factories fostered links. They demanded that the People’s Congress endorse the clause on the “organizing of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f Human Rights, so that workers have the right to form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and have collective bargaining power. They also demanded punishment of corrupt officials.

The government responded by making arrests of worker leaders in some places, and pacifying workers in others. They were particularly vigilant against cross-provincial or cross-sectoral worker linkages.⁸

The current problems reflect the turmoil and unrest in Chinese society after two decades of China’s reform policy of opening up to capitalism. They are intensified by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rise of worker struggles is a collective response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quality of life and acceleration of social injustice.

28 March 2002

⁷ *Wen Hui Bao*, 17 January 2001.

⁸ *Ming Pao*, 28 March 2002.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觀塘敬業街65號敬運工業大廈14樓N座

電話：9846 3428

傳真：2346 5268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郵地址：OctoberReview@HongKong.com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2346 5268

E-mail Address：OctoberReview@HongKong.com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第29卷 第1期 (總第208期)

2002年3月31日出版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鰂魚涌華蘭路十四號

益新工業大廈16字樓C座

電話：2563 1068

定閱：(本地) 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 平郵：每年US\$15

空郵：亞洲US\$18

其他US\$22

Subscription Rates:

Hong Kong: HKD\$80 per year

Overseas Surface Mail: US\$15 per year

Air Mail (Asia): US\$18 per year

Air Mail (Others): US\$22 per year

香港

- 2 官商緊縮開支 市民被迫犧牲..... 振言
3 反對郵政署變相大加郵費..... 微波

中國

- 4 政策激化矛盾 群眾抗爭加劇..... 張開
8 來自大慶的報告..... (轉載) 林瑾
11 關於「統計腐敗」問題..... 軍行
12 又一宗煙花爆炸大慘劇!..... 微波

阿根廷危機特輯

- 14 阿根廷人民起義..... 露西達
15 革命的日子..... 柳真譯
16 兩星期換了五個總統..... 柳真譯
17 阿根廷的經濟危機..... 柳真譯
18 阿根廷民眾進一步動員..... 霍理
19 阿根廷左派新發展..... 卡茨

國際

- 21 從「可疑船」事件看日本軍國主義.. 高島義一

- 22 越南近況..... 洵
24 越南稱讚保大勒爾..... 克禮文
24 保大勒爾——一位知名的越南學者..... 胡梧
26 安龍公司式的騙局，是資本主義美國的通例
..... 麥克勒
28 巴西大選面臨歷史時刻..... 馬卡度
29 巴西工人黨大會體現出黨內民主
..... 埃斯第默·拉莫斯
31 巴西工人黨在南里州的經驗
..... 卡羅斯·亨利魁·阿拉比

書評

- 33 《出生在戰敗之年》評介..... 瀧山五郎
34 池田五律著《海外派兵!》介紹... 長澤克巳

特譯

- 35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五) 曼德爾

英譯

- 42 Intensified contradictions and
people's resistance.....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29 ISSUE 1 2002.3.31

HONG KONG

- 2 Citizens sacrificed in austerity measures..... Zhen Yan
3 Against massive increase in postal charges..... Wei Bo

CHINA

- 4 Intensified contradictions and people's resistance..... Zhang Kai
8 Reports on mass protests from DaQing..... (reprint) Lin Jing
11 Questions around statistics on corruption..... Jun Xing
12 Another fire crackers explosion tragedy!..... Wei Bo

SPECIAL ON CRISIS IN ARGENTINA

- 14 A popular rebellion..... E.Lucita
15 Revolutionary days - eyewitness account..... (tr) Liu Zhen
16 Five presidents in two weeks..... (tr) Liu Zhen
17 How does the country end up broke?..... (tr) Liu Zhen
18 Left debates strategy as mass protests continue..... G.Foley
19 A strategic discussion..... C.Kats

INTERNATIONAL

- 21 Revival of Japanese militarism..... Takashima Yoshikazu
22 Return from Vietnam..... Tuan
24 Tribute to Boudarel..... J.M.Krivine
24 Boudarel, a noted scholar on Vietnam..... Hooou Ngoic
26 Enron-type swindles are the norm in capitalist America..... J.Mackler
28 A strategy for victory..... J.Macardo
29 Brazilian Workers Party Congress, 1999..... F.Estima,R.Ramos
31 Experience in Rio Grande do Sul..... Carlos

BOOK REVIEW

- 33 On *Born In The Year Of Lost War*..... Takiyama Goro
34 On *Sending Army Overseas*..... Wagasawa Kakumi

SPECIAL ARTICLE

- 35 Trotsky as alternative (5)..... E.Mandel

ARTICLE IN ENGLISH

- 42 Intensified contradictions and people's resistance..... Zhang Kai